

日治時期臺南高等工業學校 設立之研究*

王耀德**

摘 要

本文旨在探討日治時期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的成立背景與設校決策過程，並從專門教育制度變革中，考察高等工業學校設置論以及影響政策決定之各項要因，進而解析殖民教育體制下實業專門學校的建構歷史。經本文探討得知，學校創設背景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殖民地臺灣漸由農業轉向工業化發展，以及配合此趨勢下工業建設和南進擴張人力資源需求相呼應，在繼二次臺灣教育令頒訂及修正後，臺灣總督府藉由評議會全面檢討實業教育，從而導引出設置高等工業學校並和海外發展論述相互結合之意見。另外，有關設校決策過程，當局採取廢止臺南高等商業學校改設高等工業學校之交換作法，惟此項專校廢立調整政策，實際上涉及近 10 年間專門學校制度在臺南地區錯綜複雜的歷史糾葛。一方面顯示受制於日本國內政黨政治連動影響，臺灣總督更迭頻繁導致教育政策缺乏連貫性；另一方面也反映殖民當局在考量財政經費因素、南北地域平衡原則，以及專門教育學制改革等問題上，於日本中央政府與民眾運動者之間形成微妙的互動關係，不斷適應時勢變化，修正調整並架構醫農商工完整的專門學校體制。

關鍵詞：日治時期、實業專門學校、高等工業學校設置論、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臺南高等商業學校

* 感謝三位匿名審查學者以及本刊編委會悉心指導，惠賜諸多寶貴意見與修改建議，讓後學受益良多，謹此申致謝忱。另外，對於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提供校史檔案資料，特此一併致謝。

**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來稿日期：2010 年 9 月 15 日；通過刊登：2011 年 3 月 17 日。

- 一、前言
 - 二、創校之時代背景
 - 三、高等工業學校設置論的登場
 - 四、臺灣總督府評議會之研議
 - 五、設校構想之政策化
 - 六、結論
-

一、前言

一所學校之成立，固然有其時代及社會諸多條件因素，而為政者的教育需要、特定社會階層或集團之教育要求，亦是不容忽視的主因。尤其屬於高等教育範疇之實業專門（專科）學校的設置，除關係整體教育制度建構之問題外，順應產業經濟結構以培養專業技術人才，更是重要的教育目標。假若再將視野置於日治時期的臺灣，無疑地，創校理念強烈反映著日本帝國和殖民統治者的政策意圖。¹

近年來有關日治時期臺灣高等教育機構建校歷史之研究，大都偏重 1928 年成立的臺北帝國大學，² 而針對職業教育機關創設之探討，較傾向關注中等教育階段的實業學校，³ 至於學制上介於中間位階的實業專門學校，個案之相關論述過去似乎略顯貧乏，且大致集中於高等商業學校之考察為多，晚近則逐漸受到重

¹ 吳文星在論述日治時期的臺灣高等教育，即明晰各專門學校之設立有其特殊目的與任務，參見〈日據時期臺灣的高等教育〉，《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25（1993年9月），頁149-152。

² 如：吳密察，〈從日本殖民地教育學制發展看臺北帝國大學的設立〉，《臺灣近代史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1991），頁149-175；鄭麗玲，〈帝國大學在殖民地的建立與發展：以臺北帝國大學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陳瑜，〈台北帝國大學設立構想に関する研究〉，《教育実践学論集》8（2007年3月），頁113-124等。

³ 如：謝濟全，〈山子頂上的草根小紳士：日治時期嘉義農林學校之發展〉（臺北：稻鄉出版社，2009）；鄭麗玲，〈日治時期臺灣人的工業教育（1912-1925）：以臺灣總督府工業講習所為例〉，《臺灣風物》58:2（2008年6月），頁95-134等。

視，成為待開拓的學術新領域。⁴

作為實業專門學校之一環，於 1931 年創建的臺南高等工業學校，⁵ 即為今日國立成功大學之前身，在 1943 年臺北帝國大學成立工學部（工學院）以前，可說是全臺工業教育的最高學府，也是唯一工科高等教育機關。就日治時期的臺灣歷史而言，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的創立，不僅象徵由農業臺灣邁向工業臺灣重要之里程碑，也意味著殖民地在配合工業化和南進國策推動下，實業教育領域的擴充與提升，對於臺灣經濟和社會文化發展，深具特殊的時空背景意涵。因此，在論及日治時期臺灣高等教育，乃至於臺灣工業建設之進程上，扮演重要人力資源養成角色的該校，實為不可漠視忽略的對象。

筆者曾就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之入學問題與族群關係撰文探討，⁶ 雖然文中略述該校成立經緯，但發現其錯綜複雜的創設過程蘊含且交織著多重性的面向和因素，仍有必要深入加以分析探討，尤其以培養高階工業技術者為目標之此類學校，在後發性工業的殖民地臺灣是如何被重視而成立。基於此，本文擬從 1920 年代的歷史發展脈絡，重新審視臺灣總督府當局的專門教育政策及制度演變，並梳理官方和民間所倡議的高等工業學校設置論，以及影響設校政策決定之各項要因，以瞭解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之創建背景與設校歷程，進而究明殖民體制下臺灣高等專門教育的發展實態。

⁴ 此類學校成立之個案研究，如：陳俐甫，〈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沿革（1919-1947）〉，《臺北文獻》直字 95（1991 年 3 月），頁 81-97；藤井康子，〈1920 年代台灣における台南高等商業学校設立運動〉，《日本の教育史学》48（2005 年 10 月），頁 61-71，以及後述有關本文先行研究等。

⁵ 日治時期創校正式名稱為「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雖然 1944 年 3 月 31 日依勅令第 250 號臺灣總督府諸學校官制中改正，改易校名為「臺灣總督府臺南工業專門學校」，然而此日治末期的校名未及 2 年旋即由戰後的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而結束，歷史較為短暫，故本文仍以「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代表日治時期的該校，同時將府立之「臺灣總督府」略除。另外，戰前一般雖以「臺南高工」簡稱，惟與現今通稱的「臺南高工」（創建於 1941 年 4 月，屬中等教育階段之甲種實業學校，原名「臺南州立臺南工業學校」，今為「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易生混淆，因此除原文引用外，本文不使用「臺南高工」之校名簡稱。至於作為學制上的「高等工業學校」用詞，為免行文篇幅冗長，有時則以「高工」略稱，特此說明。

⁶ 王耀德，〈日治時期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之入學問題與族群關係〉，《臺灣史研究》16: 2（2009 年 6 月），頁 23-62。

有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之研究，至今已累積若干學術成果，⁷ 惟大抵上仍以全面性的論述居多，針對創校原委或側重背景詮釋抑或簡述梗概而未詳，對於整體學校設置過程與政策形成之相互關係，應還有更進一步探究的空間。此外，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之成立涉及臺南高等商業學校的裁撤，關於兩校興廢的歷史糾葛，藤井康子〈1920年代台灣における台南高等商業学校設立運動〉中亦有討論，深具研究參考價值，然該文主要仍著眼於臺南高等商業學校設立問題之官民互動關係，而本文則嘗試在此延長線上，期以較寬廣的視角來解析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的創設歷程。

另外，就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建校年代問題，有部分學者誤指為 1927 年，⁸ 因關係本文探討對象之歷史定位，在此宜先作確認與釐清。依據該校校史紀錄以及後述所論，1927 年原係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召開的時間，當時對於諮詢案雖有設立高等工業學校之建議，惟具體內容與校址選定等事宜，皆尚無定論。此案後經總督府於 1928 年將構想付諸政策推動，再經 2 年籌備規劃後，始於 1931 年 1 月 7 日依勅令第 2 號公布、同年 1 月 15 日施行之臺灣總督府諸學校官制中改正，方有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之新設，繼之於同 1 月 15 日以府令第 1 號頒訂學校規則，並發佈人事令，⁹ 往後 1 月 15 日即成為該校的開校（建校）紀念日。職是之故，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確切之創立年代應為 1931 年，而非總督府評議會諮詢建議階段的 1927 年。

⁷ 如：王榮，〈日本統治時代の台南高等工業学校に関する一考察〉，《現代台湾研究》23（2002 年 7 月），頁 57-71；陳順清，〈1927-1956 之臺灣工業教育：以臺南工業專門學校與臺灣省立工學院為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編，《成功的道路：第一屆成功大學校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立成功大學，2002）內之相關論文。

⁸ 如汪知亭引用戰後臺灣省立工學院校方資料，認為一般所謂 1931 年創校之說乃是誤載，詳見汪知亭，《臺灣教育史料新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頁 142、162。又，鄭麗玲亦以 1927 年創校說，敘述 1923 年入學臺北工業學校者可銜接升學報考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參見鄭麗玲，〈日治時期臺灣人的工業教育（1912-1925）：以臺灣總督府工業講習所為例〉，頁 101。實際上，需接受 5 年制正規實業教育之該屆臺北工業學校入學生，畢業年度為 1928 年 3 月，當時官方尚未出現籌設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之計畫。另外，陳順清雖說明設立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緣起於 1927 年 10 月的總督府評議會，並正確指出 1931 年正式招收首屆入學生，但又謂「1927 年 7 月於臺南市小東門外後甲創校」，同樣持 1927 年創校之說法，且設置時間在總督府評議會之前，其相關年代疑有錯置或誤植之嫌，見陳順清，〈1927-1956 之臺灣工業教育：以臺南工業專門學校與臺灣省立工學院為例〉，頁 38。

⁹ 《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為戰前校方留下之手稿本，採編年紀要體例，記載學校的大記事），頁 1-4。

本文將在前述之問題意識與先行研究基礎上，藉由文獻檔案史料以及報紙刊物、時人回顧紀錄等，進行檢證分析。首先從宏觀角度考察創校背景，理解臺灣工業化起步與工業教育之間的對應關係，復以微觀方法分別依循臺灣教育令施行後之專門教育制度變革、總督府評議會提案建言，以及總督府文教局將構想付諸政策施行等階段，探討高工設置議論與複雜的設校決策過程，以闡明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成立的具體樣貌。

二、創校之時代背景

眾所周知，領臺後的日本一直將臺灣視為糧食的供應站，在帝國經濟圈區域分工之架構下，「工業日本、農業臺灣」乃殖民政策的基本主軸。然而歷經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景氣榮枯興衰的衝擊，殖民地經營面臨策略轉換的新局勢。尤其在1930年前後，遭逢全球經濟恐慌，為因應日臺農業競爭、臺灣農業發展飽和、日本「工業移民」等需求，以及配合南進政策之推展，總督府當局在臺灣開始推動工業化，也促成了日後「工業臺灣、農業南洋」分工型態的轉變。¹⁰

譬如1920年代後半，總督府財務、殖產兩局為突破長期深陷景氣低迷之逆境，政策理念出現明顯的變化。財務局將重心逐漸由社會政策轉向產業政策，而殖產局則主張以華南、南洋為原料供應基地，提出臺灣產業結構向工業化轉移的「加工貿易立島論」，¹¹即是鮮明實例。

首任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校長若槻道隆，在論及創校背景就指出，由農業朝向商工業進展是必然的趨勢，臺灣自不例外。雖然臺灣尚屬農業地帶而非工業地帶，且大部分主要工業僅限農產加工或家庭工業程度，但現在也出現了蔗渣製紙、天然瓦斯、酒精、蘇打（碳酸鈉）、肥料、纖維、罐頭等不少令人注目的工業。以臺灣現狀而言，固然不脫農業本位之域，然而早晚必依靠工業振興產業，此事殆無庸贅言。¹²另外，川村竹治總督針對農本主義的臺灣邁向工業化亦表

¹⁰ 張宗漢，《光復前臺灣之工業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0），頁31-35。

¹¹ 參見波形昭一，〈殖民地台灣の官僚人事と經濟官僚〉，收於波形昭一、堀越芳昭編著，《近代日本の經濟官僚》（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2000），頁328-330。

¹² 若槻道隆，〈臺南高等工業學校の開校に當りて〉，《臺灣時報》1931年6月號，頁3-6。

示，農業現在很重要，將來也同樣重要，且尚有許多開拓的餘地，但不久或許會面臨瓶頸；相反地，工業發展無可限量，臺灣現在正迎接此新天地的來臨。結合農業發展工業，此為臺灣最有利的發展方向，不只島內工業得以自給，進而亦可試圖在華南、南洋地區活躍。¹³

上述的理念與言論，不僅反映著大戰後殖民地臺灣推動工業化之時代重要性；同時也隱含著帝國視域向南延伸發展的意圖。儘管 1920 年代中期起總督府南進政策進入消極的沈滯期，¹⁴ 但並不代表就此全然退出南方舞臺而漠不關心，透過廣泛的經濟調查研究，蓄積伺機復起的資源與能量。¹⁵ 要言之，臺灣工業化進展的背後，多少觸動了南方策略再興之論述。

臺灣產業結構逐步朝工業化蛻變，從表一島內農工產值比例及其發展趨勢之推移，略可窺知端倪。1907 年農業、工業生產額所占比率分別為 81.7% 和 14.1%，至 1910、1920 年代工業生產額已上升超過 30%，大戰景氣的 1917 年甚至高達 46.2%，1932 年以後也維持在 40% 以上；相對地，農業生產額則遞降至 50% 左右。另外，若以 1902 年生產額作為基準觀之，相較於農業呈現微幅上揚，工業方面卻有長足的躍進，1917 年以降更以 10 倍以上的成長量急遽發展。

雖然量化表象之餘的實質內涵，臺灣的工業生產內容偏重以製糖為主體的食品加工業，¹⁶ 惟自 1920 年起工業產值能保持動態成長趨勢，不可忽略地，是臺灣作為南進基地構想下當局推動工業化的結果。¹⁷ 正如前述所言，臺灣的工業發展與海外擴張的南進論形成緊密的結合，如此的政策思維，實際上也反映在日後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的創校理念上。爾後，特別是建校成立的 1931 年發生九一八

¹³ 川村竹治，《臺灣の一年》（東京：時事研究會，1930），頁 41-42。事實上，川村早在 1928 年擔任貴族院議員時即已發表此觀點，並建言臺灣重視高等專門實業教育，詳見〈臺灣的發展方向を工業方面へ〉，《臺灣日日新報》，1928 年 4 月 15 日，第 7 版。

¹⁴ 中村孝志將總督府對華南南洋之涉足干預概分成四期：1895 至 1914 年以華南地區為主的搖籃期、1916 左右至 1923 年擴及東南亞的大正南進期、1924 至 1936 年間經濟不景氣下的沈滯期，以及 1938 左右至 1945 年追隨帝國南侵政策之時期。中村孝志，〈台湾と「南支・南洋」〉，收於氏編，《日本の南方関与と台湾》（奈良：天理教道友社，1988），頁 5-6。

¹⁵ 中村孝志，〈台湾と「南支・南洋」〉，頁 22-25；後藤乾一，〈台湾と南洋：「南進」問題との関連で〉，《近代日本と東南アジア：南進の「衝擊」と「遺産」》（東京：岩波書店，1995），頁 88-94。

¹⁶ 溝口敏行、梅村又次編，《旧日本植民地經濟統計》（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1988），頁 47-49。

¹⁷ 林鐘雄，《臺灣經濟經驗一百年》（臺北：自刊本，1998），頁 63-64。

事變，再經 1937 年的中日戰爭爆發，政策延續至小林躋造總督所揭櫫之「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治臺三原則，主張南方政策之根本在於臺灣島民的皇民化和產業工業化。¹⁸ 於是臺灣從農業本位經濟轉向軍需產業為重點的工業化，逐漸成為米糖生產、軍需工業品生產和南進的三重基地。¹⁹

表一 臺灣各類產業生產額比例表（1902-1937）

年度	總數		農業		工業		林業		水產業		其他
	生產額 (千圓)	指數	產額 (%)	指數	產額 (%)	指數	產額 (%)	指數	產額 (%)	指數	產額 (%)
1902	71,752	100	78.3	100	16.8	100	0.1	100	1.9	100	2.9
1907	91,126	127	81.7	132	14.1	106	0.1	201	1.6	109	2.5
1912	146,374	204	63.4	165	32.1	389	0.1	200	1.4	149	3.0
1917	268,154	374	48.7	232	46.2	1,027	0.8	3,361	1.8	351	2.5
1922	363,095	506	51.3	331	39.3	1,183	3.1	18,012	2.8	749	3.5
1927	511,216	715	53.3	485	36.4	1,541	2.8	23,274	3.4	1,254	4.1
1932	545,219	760	51.2	396	41.8	1,890	1.9	16,840	2.5	1,009	2.6
1937	841,076	1,172	47.9	717	43.3	3,016	2.0	26,790	2.5	1,555	4.3

資料來源：根據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編，《臺灣農業年報：昭和十七年版》（臺北：該局，1943），頁 18-19 核算編製而成，年度以每 5 年摘錄方式表列。

說明：指數以 1902 年為 100 作基準。

為適應上述時局與殖民經營策略的轉換，以及臺灣產業結構之變遷，在人力資源供給方面的實業教育改革，遂成為重要的政策課題。1927 年總督府召開評議會討論實業教育議案，且具體推行革新措施，可謂最佳明證。亦即，一方面擴充實業專門學校領域，從過去的醫學、農林、商業，進而延伸至工業部門；另一方面提升工業教育層級，在現有中等實業教育階段僅只一所臺北工業學校的基礎上，新設高等工業教育機關。

¹⁸ 宗代策，《小林躋造傳》（東京：帝國軍事教育會，1939），頁 21-37。

¹⁹ 涂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の台灣》（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1），頁 127。

就日治時期臺灣的工業教育而言，創始於 1912 年、專收臺籍生以培養初級技術人員的總督府工業講習所是為肇端；此外，依種族隔離教育原則，當局於 1918 年另為日人子弟設立總督府工業學校。兩校歷經數度更名與主管機關轉移，在 1923 年合併為「臺北州立臺北工業學校」，實施日臺共學制度。²⁰基本上，隸屬於中等實業教育之臺北工業學校，無論自初期的職工訓練或到後來的工業技術者養成，其教育目標主要定位在培植中階的技術人員，至於高階技術者或研究人才，在當時臺灣缺乏工業類相關高等教育機構之情況下，全需仰賴日本國內高工或工業類大學（綜合大學之工學部）的出身者。²¹因此，在積極拓展臺灣工業化之際，總督府必須考量當前產業人力結構是否足以支應的問題，這不單牽涉高階技術人員需求大增，也關係島內涵蓋工業學校以及中等普通學校畢業生教育銜接的現實問題。

誠然，為應付當時諸如日月潭水力發電復工計畫、²²高雄港築港工程²³等各項重點工業建設及日後營運，基層勞工尚且可由本地臺灣人供給，惟工業技術者若僅憑恃一所實業學校程度的臺北工業學校畢業生，或繼續仍全數倚仗自內地日本引進，無論質或量勢將面臨捉襟見肘之困境。是故，在推動臺灣工業化和強調南進性格的進程上，創設高等工業學校得以自產方式培育高階工業技術人才，同時也藉此擴大並暢通升學機會管道。

²⁰ 有關日治時期臺灣工業教育發展，參見鄭麗玲，〈日治時期臺灣人的工業教育（1912-1925）：以臺灣總督府工業講習所為例〉，頁 98-104。此外，關於臺北工業學校之教育狀況，可見鄭麗玲，〈近代化、平等化與差別化之間：臺北工業學校學生之就學與就業〉，《臺灣史研究》16: 4（2009 年 12 月），頁 81-114。

²¹ 鄭麗玲，〈日治時期臺灣人的工業教育（1912-1925）：以臺灣總督府工業講習所為例〉，頁 112。

²² 電力可說是一切工業之母，臺灣的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始於 1919 年，之後遭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經濟蕭條，在經費拮据下被迫於 1926 年停工。復經上山滿之進、川村竹治、石塚英藏等總督努力籌畫再興，於 1931 年正式復工，1934 年竣工完成。嗣後，1935 年至 1937 年又進行第二發電所建造計畫。參閱張宗漢，《光復前臺灣之工業化》，頁 74-75；鄧相揚，《臺灣的心臟》（南投：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2008），頁 47-65、123。

²³ 高雄港第二期築港工程自 1912 年至 1937 年，其建港效益造就了高雄州自動車工業株式會社、南日本化學工業株式會社、日本鋁業株式會社等多家廠商進駐高雄設廠，促使高雄此後成為全島工業重鎮。參見楊玉姿、張守真，《高雄港開發史》（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2008），頁 72-73、79。

《臺灣教育沿革誌》針對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成立原因，歸納如下說明：(1) 當時臺灣的專門教育機構，醫學、農業、商業皆已具備，唯獨工業尚付闕如，島內工業技術者均需仰賴內地；(2) 島內子弟欲入學工業專門學校，非遠赴日本不可，諸多不便，況且就學意願者有逐年增加趨勢；(3) 伴隨島內各種產業興盛，工業次第呈現發展機運，學有專精的工業技術人才需求若渴；(4) 順應島內工業發展，增益臺灣產業發達。²⁴

此說明正顯示當時臺灣本身在工業技術人才方面存在著供需失調的現象，也反映臺灣實業專門教育體制之缺陷，以及對內地高級專技人員相當依賴之程度。若槻道隆指出，受過工業相關專門教育（大學教育除外）而在臺灣就業之人數超乎想像的多，根據 1930 年的調查，以出身機械工學科 110 名、應用化學科 88 名為首，其總數已達 425 人。另外，在島內完成中等教育而志願升學工業專門學校者，近年逐漸增加，1926 年有 21 名，1928 年 52 名、1930 年 99 名，迄至 1931 年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創立首屆招生，報考人數已高達 408 名之多，顯見今日青年對工業抱持高度的興趣。若槻進一步表示，假若能給予這些有志向學者工業相關的專門知識，不僅可因應島內需要，更能提供中國或南洋方面的工業人才。²⁵

不啻如此，事實上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之設立一如當年臺北帝國大學設置計畫，²⁶ 總督府在島內成立高等教育機關之目的，一來可抑制並阻斷臺灣人負笈海外留學之路；二來培養經營殖民地的日本人才，且讓在臺日人能繼續留在臺灣活動；三來提供圖謀南方發展之學術研究與人力資源，可謂兼具截留臺人赴外地求學、續留在臺日人永住活動，以及培植殖民地和南進策略經營人才等多面作用。

根據 1930 年 12 月總督府及拓務省提報日本內閣會議官制改正之相關資料，更能詳知上述殖民當局需設立高工的政策思維與焦慮。內文陳述之理由和說明書中提到，臺灣現今教育設施略具完備，唯獨工業教育機關僅有中學程度之臺北工業學校一所，「甚屬遺憾」。有鑑於臺灣工業日漸盛況，「擁有稍高教養之工業技

²⁴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該會，1939），頁 950-951。

²⁵ 若槻道隆，〈臺南高等工業學校の開校に當りて〉，頁 4。

²⁶ 吳密察，〈從日本殖民地教育學制發展看臺北帝國大學的設立〉，頁 164-170。

術員」迫切急需，但囿於現行工業教育制度未臻完善，不僅人才悉數仰靠內地，且志願升學者不斷外流。因此，為齊備在臺教育設施，並因應臺灣工業發展需求，以資振興產業，實有必要設置高等工業學校。²⁷

另外，參照該公文書「附屬書類」表據，臺灣各中等學校畢業生報考及入學島外高工人數，有逐年增加趨勢，其中尤以中學校出身者占多數（參見表二）；而以 1930 年度在日本內地高工就學人數為例，臺灣人已超過在臺日人（參見表三）。為臺灣工業建設發展，架構完整之工業教育體系以自立培養人才，並阻留工業志學者外移，總督府的用意由此可見一斑。

表二 臺灣各中等學校畢業生報考及入學島外高等工業學校
人數統計表（1926-1930）

年度	人數	臺北 一中	臺北 二中	新竹 中學	臺中 一中	臺南 一中	臺南 二中	嘉義 中學	高雄 中學	臺北 工業	合計
1926	報名	12	0	0	1	0	0	0	0	8	21
	入學	4	0	0	0	0	0	0	0	3	7
1927	報名	8	0	3	0	4	2	0	2	10	29
	入學	1	0	1	0	0	1	0	1	3	7
1928	報名	10	0	2	3	9	12	0	10	6	52
	入學	2	0	1	0	2	3	0	0	2	10
1929	報名	15	16	5	3	23	12	5	10	7	96
	入學	5	0	0	1	4	2	0	3	3	18
1930	報名	14	10	5	2	15	12	18	13	10	99
	入學	1	2	2	0	1	3	3	0	3	15
合計	報名	59	26	15	9	51	38	23	35	41	297
	入學	13	2	4	1	7	9	3	4	14	57

資料來源：根據〈台湾總督府諸學校官制中ヲ改正ス〉內「附屬書類」核算編製而成，《公文類聚》第 55 編・昭和 6 年・第 9 卷・官職 7・官制 7（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A01200619500・類 01735100）。

說明：基隆中學、臺中二中、臺北商業學校、宜蘭農林學校、臺中商業學校、嘉義農林學校、屏東農業學校等 7 校，因人數皆為 0，故本表予以略除。

²⁷ 〈台湾總督府諸學校官制中ヲ改正ス〉，《公文類聚》第 55 編・昭和 6 年・第 9 卷・官職 7・官制 7（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A01200619500・類 01735100）。

表三 臺灣在住者於日本各高等工業學校就學人數統計表
(1930年9月)

校名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合計	
	臺灣人	日本人	臺灣人	日本人	臺灣人	日本人	臺灣人	日本人
東京工業大學附屬工學專門部	0	0	0	0	1	0	1	0
東京高等工藝學校	0	0	0	1	0	0	0	1
京都高等工藝學校	0	1	0	0	0	0	0	1
大阪工業大學附屬工學專門部	0	0	0	0	2	0	2	0
神戶高工	0	0	0	0	1	0	1	0
橫濱高工	2	0	2	0	2	1	6	1
名古屋高工	2	0	2	0	0	0	4	0
仙台高工	1	0	0	2	0	0	1	2
米澤高工	0	0	0	0	0	1	0	1
秋田鑛山專門學校	0	1	1	0	0	0	1	1
長岡高工	0	0	0	0	1	0	1	0
金澤高工	1	0	0	0	0	0	1	0
福井高工	0	0	0	0	0	1	0	1
桐生高工	0	0	0	0	1	0	1	0
山梨高工	0	0	1	0	1	0	2	0
德島高工	1	2	1	0	1	0	3	2
廣島高工	0	1	1	2	2	2	3	5
明治專門學校	0	0	0	0	0	1	0	1
熊本高工	0	2	0	5	0	0	0	7
合計	7	7	8	10	12	6	27	23

資料來源：同表二。

說明：濱松高工、京城高工等2校，因人數皆為0，故本表予以略除。

綜上所述，歷經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景氣盛衰興替之變局，牽動著帝國框架內殖民地定位與經營策略的調整與更易。伴隨臺灣農商產業發達，工業日益興隆，由農業向工業轉型成為必然趨勢，島內工業產值的躍升，象徵「圖南飛石」的南進基地臺灣，在大戰後開始奏起邁向工業化轉變之序曲。因應產業結構變遷與工業發展契機，總督府在經過二次臺灣教育令的頒訂和修正後，於1920年代後期起也逐漸正視實業教育問題，並著手檢討、改革專門學校制度，遂有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之誕生。然而，在如此的時代背景下，學校的設立係如何被提議討論？在決策過程中當局有何因素考量？又牽涉何種問題或困難？以下將考察重點置於1920年代專門學校教育政策與制度之演變，依序加以探究分析。

三、高等工業學校設置論的登場

(一) 商業專門學校廢校替代案

1919年總督府頒訂臺灣教育令，具體架構以臺灣人為對象的全面性教育制度，也開啟臺灣人接受有系統專門教育之途徑。依循該法令種族隔離為原則的雙軌制度，公學校畢業之臺籍學生就讀由總督府醫學校改制而成的醫學專門學校，以及新設的農林、商業專門學校等三校；日本人則按內地法令，中學校畢業後升學進入醫學專門學校附設之醫學專門部與新成立的高等商業學校等二校，上述學校中，除商業專門學校（以下簡稱「商專」）位於臺南外，其餘各校均設在臺北。就整體專門教育制度而論，日臺分途就學與學校基準程度之差異，顯見殖民教育所蘊藏的差別歧視與偏頗之本質；但另一方面學校涵蓋各類實業職種，以及商業性質學校在南北兩大都設校之佈局，也意味著適應臺灣實情現狀與空間地域的平衡發展。

1922年配合內地延長主義，貫徹日臺融合的同化教育理念，進行修正臺灣教育令（新臺灣教育令）。專門教育在與日本國內法制整合且實施日臺共學制的單軌體系下，升格改制原先臺灣人就讀學校之層級位階和日本相同，並整編發展成為醫學專門學校、高等農林學校及原有的高等商業學校。²⁸ 至於前期專收臺籍學生的臺南商專，為適用日本內地學制，且同質性的商業類專門學校二所無並存需要，當局遂決定予以廢校，待1927年末屆學生畢業前，繼續以舊制運作校務。²⁹

伴隨著南臺灣唯一最高學府商專的廢校，不僅阻絕了臺灣青年學子升學之路，也打破專校南北均衡態勢，引發南部民眾憂慮與不安，³⁰ 進而串連全島學生家長和臺籍有識之士，以臺南為中心展開請願運動。³¹ 由於商專本身學制不符新臺灣教育令規定，勢必面臨「自然消滅」之命運，因此運動訴求主軸從初期的存續商專轉變為升格高商，企盼將現有在校生直接轉編入改制後的高商。³² 在此同

²⁸ 高等商業學校1919年創校正式名稱為「臺灣總督府高等商業學校」，1926年因「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商業學校」成立，乃改名為「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商業學校」，以下互以「臺北高商」、「臺南高商」簡稱之。

²⁹ 吉野秀公，《臺灣教育史》（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7），頁533；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943。

³⁰ 〈諸羅特訊：父兄希望〉，《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2月17日，第6版。

³¹ 〈臺南：商專問題熾ん〉，《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2月17日，第4版。

³² 〈臺南商業專門學校 全島父兄大會 新教育令に依る高等商業學校たらしむべく請願〉，《臺灣日日

時，因商專若升格為高商則可增加日人子弟就學機會，故升格論在地方日籍人士之間亦受到高度關注。

面對民間方興未艾的升格運動，官方媒體隨即登載當局立場和可能採取的善後對策，要約之：(1) 依新臺灣教育令，商專自然當廢；(2) 升格高商困難，主因為本島無設置二所高商之必要，也難獲拓殖局或文部省之應允，況且現今臺北高商招生陷入瓶頸，加上根據專門學校令，高商入學資格需修畢 5 年制中學校課程，以目前臺籍學生而言，根本無人具有此項資格，³³ 徒增設一所高商卻無益；(3) 檢討中的商專替代方案有設立高等工業學校、設置臺北高商分教場、改設甲種實業學校的商業學校等三案。職是之故，輿論呼籲民眾停止一切「無效的示威運動」，靜待總督府研擬良策，並期勉臺南地方官憲應積極介入協調，善盡上意下達督導之責。³⁴

如是觀之，早在 1922 年代，當局即曾提議在臺南設立高等工業學校，以代替廢校後的商專。時任總督府內務局長的末松偕一郎，重申官方態度並明確表示：

本島尚無高等工業學校，放眼未來臺灣工業發展，數年後必將迫切急需，因此下一個應設立的專門學校乃是高等工業，此為自然趨勢。但設置高等工業學校需將近二百萬圓經費，且招生來源是否充足猶存疑慮。倘若認為臺南屬商業地帶而希望設有商業性質之學校，無寧說甲種程度的商業學校較適宜，如果加上也設立高工，此樣的規劃對地方人士而言，應該比起高商更加歡迎才是。³⁵（筆者譯）

新報》，1922 年 2 月 20 日，第 2 版；〈臺南商專父兄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2 月 21 日，第 5 版。另外，〈臺灣商專問題〉、〈商專父兄大會〉兩則報導，見《臺南新報》，1922 年 2 月 20 日，第 5 版。³³ 當時臺籍男子就讀之中等學校僅有一所創建於 1915 年的臺中州立臺中第一中學校，惟修業年限 4 年，不符報考專門學校資格，縱使 1922 年依新臺灣教育令改制為 5 年，或者新設日臺共學的其他新制中學校，但仍須俟 5 年後 1927 年方有具資格之考生來源。至於日籍學生方面，雖然均係 5 年制中學校，但也只有臺北州立臺北第一中學校與臺南州立臺南第一中學校二校，臺北高商為提升報考生的質與量，尚且需向日本內地招募。

³⁴ 〈臺南商專問題 高等商業設置は困難と某消息通は談る〉，《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2 月 21 日，第 2 版；〈商業學校問題と父兄の運動 地方官憲の努力を望む〉，《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2 月 22 日，第 3 版。

³⁵ 〈臺南商業專門學校 問題は事理明白である 運動者等には一切面會せざる考である 末松內務局長談〉，《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2 月 23 日，第 3 版；〈商業學校問題 末松內務局長談〉，《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2 月 25 日，第 5 版。此外，同樣內容亦見於《臺南新報》，1922 年 2 月 23 日，第 1 版。

上述總督府的善後三案對策以及末松之發言，引起各方議論紛紛。臺南在地報紙於社論中即表達對近期幾乎無法實現的高工設立案，頗感悲觀，反而認為變成臺北高商分校乃當局舉手之勞的可行方案，因此敦請府方體念運動陳情者的誠意，在不違反法令的容許範圍內，以親切態度致力於滿足地方人民。³⁶ 另外，法曹界聞人佐藤三之助亦為文分析該三案均有窒礙難行之處，從而建言活用法律解釋以爭取轉圜餘地，應不失為一舉兩得的解決良方。³⁷ 相較於此，《臺南新報》主編川上八百藏則站在南進發展觀點，完全贊同末松之見解，主張南臺灣之實業教育，原則上在商業方面普及充實普通程度之商業學校即可，而工業方面則有必要設置高等工業教育機關。³⁸

至於官方媒體再度為總督府辯護，並且語帶保證，樂見當局善意回應。該社論略謂：臺南是臺灣第一商業地點，即便今日商專廢校，無論甲種商業學校抑或臺北高商分教場，當局必當擇一而設，此事殆無疑義；同時，工業地帶的臺南擁有地利優越性，正值臺灣由農業本位漸次轉換為農工並立之際，臺南亦是設立高等工業學校最佳適當之所，是故，只要市民摒棄焦躁妄動之舉，與地方官憲緊密聯繫，秉持穩健有秩序的行動誠心努力，吾人保證終將獲致最後勝利，屆時我等必定克盡一臂之力，在所不辭。³⁹

嗣後，末松局長親臨臺南舉行商專廢校說明會，面見臺日地方要人，表明設置高商或成為臺北高商分校皆無希望，依本島實情將來唯有設立高等工業學校較有可能性，但也明確表示並非就此決定設置高工取代商專，本案仍須多費時日審慎研究。末松進一步指出未來高工的成立，臺南具優先權，且應許必竭力向總督說項，至於商業教育方面，仍舊認為甲種商業學校確實需要，縱使日後臺南設置高工，也應另設甲種商業學校。雖然會議席上地方官紳希望當局約定自 1923 年度起著手規劃設立高工，惟末松未置可否，僅允諾將以書面陳報總督。⁴⁰ 於是，爭

³⁶ 〈商專に對する宣告的言明〉，《臺南新報》，1922 年 2 月 24 日，第 1 版。

³⁷ 〈商專問題解決私案 佐藤三之助〉，《臺南新報》，連載於 1922 年 3 月 1 日，第 1 版；3 月 2 日，第 1 版。

³⁸ 〈南部臺灣の實業教育 商專問題解決の一考察 川上生〉，《臺南新報》，連載於 1922 年 3 月 1 日，第 1 版；3 月 2 日，第 1 版。

³⁹ 〈再び商業學校問題に就きて〉，《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3 月 3 日，第 3 版。

⁴⁰ 〈臺南商專問題に就て 末松局長臺南にて語る〉，《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3 月 3 日，第 4 版。

論月餘之商專廢校善後處理問題，在總督府暗示性的模糊政策，以及末松局長不確定性承諾的情況下，市民請願運動逐漸歸趨沈寂，而面對前途難料之商專學生則興起一波轉學中學校的風潮。⁴¹ 之後，隨著 1922 年 11 月末松因病停職返日，⁴² 加上 1923 年 9 月總督更迭，設置高工案也就此曇花一現而石沈大海。

由上可知，高工設置論的初次登場，係作為商專廢校替代案選項之一，而被官方提出。固然末松立足於建構完整專門教育制度之觀點，強調設立高工的重要性，惟理念並未立即落實。推究其因，除招生來源堪慮外，龐大的經費負擔不容小覷，況且末松之前擔任財務局長（1917 年 9 月-1920 年 11 月），對於總督府財政體系理應知悉甚詳；加上面對新臺灣教育令施行後之學制改革，以及以成立臺灣大學為前提而於當年創校的臺北高等學校，⁴³ 無論在教育政策或經費方面，比起設立高工，此些事項才是當局必須優先考量處理的急務。

至於當時的民情輿論如何看待高工設置論，除川上八百藏積極表態支持外，大致上反應普遍消極，或許以在地人為主體的運動陳情者站在臺南屬商業都市觀點，以及維護現有教育權益立場，認為以既成商專資源升格高商，較諸無法立刻實現而需等待之高工來得容易且合理，這點主張事實上也反映在日後的臺南高商新設運動。另外，從當時媒體報導可知，在地報紙傾向務實論述，而官方媒體則依隨總督府意向傳遞訊息，但事後卻一反常態，嚴厲指責當局和校方對教育政策方針毫無遠見，且縱容「自殺性升格運動」蔓延擴大，⁴⁴ 其態度瞬息驟變，頗耐人尋味。

（二）臺南高等商業學校之成立

由於總督府提議之善後三案遲未兌現，經兩任總督更替，在迫近商專廢校前的 1925 年 6 月，市民請願運動再次復燃，而訴求目標也由升格論轉為新設高等商業學校，以象徵商專精神之延續。有關臺南高商迄至 1926 年 8 月勅令公布官制、

⁴¹ 〈臺南商專豫科生六十五名引上ぐ 解散別離の紀念撮影を為し旗を捲いて歸郷す〉，《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3 月 5 日，第 7 版；〈臺南商專之臨歧一哭〉，《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3 月 6 日，第 6 版。

⁴² 「大正 11 年（1922）高等官進退原議」，〈末松偕一郎（休職仰付並賞與施行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 3451，文號 31。

⁴³ 關於臺北高等學校的創立，參見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頁 11-25。

⁴⁴ 〈自殺的なる昇格運動〉，《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3 月 14 日，第 3 版。

9月正式創校的這段設立運動歷史，非本文考察範疇，且已有專論先行研究，⁴⁵ 此處不再贅述。但是，該校之成立與日後的廢校牽涉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設校經緯，茲彙整要點探討說明如下。

首先，在政府官方方面，末松所暗示的高工設置案遲未落實，乃基於經費因素。⁴⁶ 時任總督府評議會員的津田毅一亦曾面謁伊澤多喜男總督，重述當年末松之高工聲明，並提議規劃中的臺灣大學將其某一學部，或農科、商科抑或法科設於臺南，但未果。⁴⁷ 至於當局一直堅持臺灣無設立二所高商必要之立場為何後來逆轉，除承受來自民間運動之壓力外，也體認在南部成立專門學校的實際需要。⁴⁸ 總督府在1926年8月4日提報內閣會議之「臺南高商新設說明書」中記述：臺南商專伴隨新教育令之制定而廢校，總督府站在應新設某種專門學校以代替的立場，而臺南屬商業中心地，認為高商較為適當，雖曾有設立高工之說，惟有鑑於臺南實情，故作此適切判斷。⁴⁹ 又，1926年9月27日臺南高商開校典禮上，後藤文夫總務長官說明「鑑於本島實情及其地理、人文環境，本校有迫切設立之必要。臺南係本島古都，亦為往昔華南、南洋貿易通商之要衝，校址擇定此處，絕非偶然。」⁵⁰ 強調該校在臺南設立之必要性和重要性。顯見當局不僅顧及南北地域平衡，也重視臺南兼具商業、文化古都及對南發展之地方特性。

然而，事實上臺南高商的創設過程幾經波折，⁵¹ 其最大阻礙乃是遭遇內地法制局的反對，所持理由依然是臺灣無設立二所高商之必要，法制局以當年商專廢校的理解上，認定若如臺北高商般只是為收容內地過剩學生，則新設高商毫無意義。⁵² 嗣後雖經府局雙方折衝妥協，甚至延宕至下任總督上山滿之進時始獲中央

⁴⁵ 詳見藤井康子，〈1920年代台湾における台南高等商業学校設立運動〉，頁63-66。

⁴⁶ 〈臺南有志の高商設置運動〉，《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6月20日，第2版。

⁴⁷ 〈臺南高商設置運動 大學一部設置は絶望 高商設置期成同盟會〉，《臺南新報》，1925年7月9日，第2版。

⁴⁸ 吉野秀公，《臺灣教育史》，頁470；〈臺南の懸案は解決 高等商業、嘉南大圳、神社列格 木下長官代理談〉，《臺南新報》，1925年12月6日，第2版。

⁴⁹ 〈台湾總督府諸学校官制中、高等官官等俸給令中ヲ改正ス〉《公文類聚》，第50編・大正15年-昭和元年・第11卷・官職7・官制7（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A01200550600・類01567100）。

⁵⁰ 〈南支南洋に用意されたる臺南高等商業學校 二十七日開校式を擧ぐ〉，《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9月28日，第5版；〈臺南高等商業學校開校式に於ける後藤總務長官の訓示〉，《臺灣時報》1926年10月號，頁1。

⁵¹ 〈臺南高商官制公布〉，《臺灣時報》1926年9月號，頁19。

⁵² 〈臺南高商の官制が行き悩む 關係者は一日千秋の想ひ〉，《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5月19日，

政府諒解，⁵³ 但是由此可知，新臺灣教育令後的臺南在地專門學校，總督府既顧慮南北地域平衡而無法全然漠視地方民眾之教育需求，卻又徘徊於高商是否需二所存在的困惑中，顯示殖民教育政策矛盾之性格。論者亦曰：在臺灣原本就沒有設置二所高商之必要，設立臺南高商只不過是廢除商專之後的一種權宜措施。⁵⁴ 因此，基本上臺南高商之成立構築在脆弱的體制基礎上，這也是日後為設高工而調整專門教育機關時，成為廢校首要目標之最大主因。

其次，就民間運動部分而言，一方面以商專廢校的 1927 年當屆，全臺將共有 8 所改制或新制之中學校產生畢業生，來推翻總督府素來假借招生來源堪慮而不設專門學校的理由；另一方面立足於南臺灣觀點發聲，標榜「全臺首學」臺南之教育傳統，強調南臺灣唯一專校的裁撤，必然招致地方文化教育停滯不前，同時也抑制南部多數子弟向學之心，為維繫古都的「繁榮與面子」，籲請當局新設高商，也據此尋求臺南在地日臺有力人士之奧援，並喚起社會輿論重視。⁵⁵ 其訴求主張廣獲市民支持，運動參與者眾，成員涵蓋商工、政界和新聞界日臺重量級地方人物，無形中增加與府方談判之籌碼，儼然構成強勢的壓力團體。

不過，表面上看似共同利害關係結合形成的日臺聯手大行動，實質上雙方各懷所思，別具意圖。日籍人士較著眼於擴大其子弟就學利益；而臺籍成員雖同樣關注升學問題，但更側重臺人本位學校商專精神之歷史傳承意涵，如此「同床異夢」的思維，在面對法制局反對設校所反映出的相異立場見解，立可窺知端倪。譬如日方媒體就單純站在行政程序觀點，批判法制局「不法、無謀」的越權作為，

第 5 版；〈臺南高商の官制で法制局頑張る 然し大體諒解したらしい 次の問題は校舍新營〉，《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6 月 3 日，夕刊第 2 版；〈臺南高商と文教局〉，《臺南新報》，1926 年 7 月 27 日，第 1 版。實際上，當時除臺南高商成立案外，另有總督府文教局官制設置案同樣亦遭法制局反對而被擱置。

⁵³ 參見如下報導：〈法制局と督府側の今日の會見で決る臺南高商問題 文教局の審議はその後〉，《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6 月 8 日，第 2 版；〈臺南高商問題 昨日督府側と法制局側の會議を開く 結局山川長官に一任〉，《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7 月 16 日，第 2 版；〈督府文教局與臺南高商 新設問題近應解決〉，《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7 月 25 日，第 4 版；〈二十八日閣議上程の臺南高商案 多少の修正は免れまいが 結局通過するだらう〉，《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7 月 27 日，第 2 版；〈臺南高商設置 閣議にて承認さる〉，《臺南新報》，1926 年 8 月 5 日，第 2 版。

⁵⁴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949。

⁵⁵ 〈商業専門の存續運動〉，《臺灣日日新報》，1925 年 6 月 16 日，第 2 版；〈臺南高商設置問題 請願書起草委員會〉，《臺南新報》，1925 年 6 月 17 日，第 2 版；〈臺南高商設置問題運動 商專同窓會の熱情〉，《臺南新報》，1925 年 6 月 18 日，第 1 版；〈臺南有志の高商設置運動〉，《臺灣日日新報》，1925 年 6 月 20 日，第 2 版。

對於該局無視既已通過國會決議之法案並擱置拖延，恐將損及官廳威信，為統治帶來不堪設想之後果。⁵⁶ 至於臺人有識者輿情，不僅駁斥法制局背離現實的誤謬理由，從而譴責總督府之「教育榨取政策」，強調相對於日人本位傳統的臺北高商，籌畫新設之臺南高商雖係日臺共學，「但在地點和歷史的系統上」，意味著臺人本位商專精神之延續。⁵⁷ 尤其臺南高商成立後，多數教職員兼任兩校並暫借商專充當校舍，⁵⁸ 之後也接收商專廢校後所有校產，⁵⁹ 這點更代表其繼承校史精神的正當性。因此，運動結構體所潛藏的侷限性，以及貌合神離之民意觀點差異，在日後面臨為設立高工而撤廢高商政策之際，其內在矛盾即顯露於日臺族群之間，甚至也呈現在與臺南高商有無直接關係的市民社群之間。

綜上而論，臺南高商成立之脆弱性和侷限性，為往後的廢校之路埋下歷史的伏筆，但另一方面該校之創設也意味著高工設置論的退場，總督府最後決定捨高工而立高商，實涵括多項因素。首先，受制於日本國內政黨政治連動影響，總督由偏政友會系之田健治郎、內田嘉吉，改換為執政黨憲政會系的伊澤多喜男及上山滿之進，總督的更迭導致政策無法連續是為其一。而伊澤總督受其兄長伊澤修二影響，重視與臺民關係，也關切教育問題，⁶⁰ 較能寬容接納民間運動者心聲是為其二。此外，無疑地，財政經費考量亦為關鍵主因，特別是籌設臺灣大學乃當年教育政策重心，自 1925 年度起業已編列預算，⁶¹ 時值日本推動行財政整理方針，需耗費鉅資的高工實無容身立錐之空間。

如表四所示，末松提出高工設立案之 1922 年臺北高等學校成立，1925 年起籌備帝國大學及增設臺北高等學校高等科，隨著高等普通教育機關之設置與擴張，在教育財政劃分方面開始出現排擠現象。雖然表面上各校經費大致逐年增加，

⁵⁶ 〈督府文教局與臺南高商 新設問題近應解決〉，《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7 月 25 日，第 4 版；〈臺南高商と文教局〉，《臺南新報》，1926 年 7 月 27 日，第 1 版。

⁵⁷ 〈打破教育榨取政策 宜設臺灣人本位的臺南高商〉，《臺灣民報》116，1926 年 8 月 1 日，第 1 版。

⁵⁸ 〈臺南高商校長教授 官制發布と共に發表 多く商專教授の兼任らしい〉，《臺南新報》，1926 年 8 月 10 日，第 2 版；〈臺南高商敷地問題 近く督府から關係者出張實地檢分を行ふ〉，《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8 月 15 日，第 2 版。

⁵⁹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943。

⁶⁰ 參見伊澤多喜男傳記編纂委員會編纂，《伊澤多喜男》（東京：羽田書店，1951），頁 147-160。另外，伊澤於 1926 年 7 月 16 日轉任東京市長後，依然關心臺南高商設置通過之問題，參見伊澤多喜男文書研究会編，《伊澤多喜男關係文書》（東京：芙蓉書房，2000），頁 236-237。

⁶¹ 陳瑜，〈台北帝國大學設立構想に関する研究〉，頁 115-118。

但在有限財源之情況下，多少壓縮到部分學校之分配比率。除商專因不再招生，隨自然減班而費用和所占比率遞減外，其他如 1925 年之臺北高商、1926 年的高等農林學校則較往年有懸殊的落差，醫學專門學校也呈現微降趨勢。因此，自籌設到完成約需 200 萬圓高額投資的高工，在現實面上確難獲得當局認同採納。

表四 日本國庫支應臺灣總督府直轄學校及其他教育費用統計表
(1919-1931)

年度	合計 (100%)	商專 (%)	臺南 高商 (%)	臺南 高工 (%)	高等 農林 (%)	附屬 農林 (%)	醫學 專門 (%)	臺北 高商 (%)	臺北 高校 (%)	臺北 帝大 (%)	其他 (%)
1919	972	34 (3.5)			17 (1.7)		131 (13.5)	27 (2.8)			763 (78.5)
1920	1474	68 (4.6)			44 (3.0)		214 (14.5)	94 (6.4)			1054 (71.5)
1921	1934	108 (5.6)			82 (4.2)		267 (13.8)	129 (6.7)			1348 (69.7)
1922	2077	91 (4.4)			121 (5.8)		253 (12.2)	132 (6.4)	59 (2.8)		1421 (68.4)
1923	2251	77 (3.4)			152 (6.8)		253 (11.2)	153 (6.8)	76 (3.4)		1540 (68.4)
1924	3008	68 (2.3)			218 (7.2)		246 (8.2)	347 (11.5)	94 (3.1)		2035 (67.7)
1925	3155	63 (2.0)			322 (10.2)		238 (7.5)	148 (4.7)	186 (5.9)	42 (1.3)	2156 (68.4)
1926	3898	47 (1.2)	37 (0.9)		215 (5.5)		243 (6.2)	152 (3.9)	271 (6.9)	207 (5.3)	2726 (70.0)
1927	4611	廢校	85 (1.8)		237 (5.1)		287 (6.2)	158 (3.4)	348 (7.6)	374 (8.1)	3122 (67.7)
1928	5589	—	101 (1.8)		併入帝 大附屬 農林	155 (2.8)	310 (5.6)	176 (3.1)	316 (5.7)	868 (15.5)	3663 (65.5)
1929	6017	—	廢校	19 (0.3)	—	148 (2.5)	338 (5.6)	276 (4.6)	409 (6.8)	2121 (35.2)	2706 (45.0)
1930	6236	—	—	193 (3.1)	—	145 (2.3)	383 (6.1)	218 (3.5)	274 (4.4)	2333 (37.4)	2690 (43.1)
1931	5207	—	—	517 (9.9)	—	129 (2.5)	341 (6.6)	163 (3.1)	237 (4.6)	1481 (28.4)	2339 (44.9)

資料來源：本表之核算編製，根據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學務課編，《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臺北：該課，1921-1926），第 18-23 年報；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編，《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臺北：該局，1927-1933），第 24-30 年報。

說明：(1) 金額單位：千圓。

(2) 各直轄學校費用含新營費。

(3) 其他包括：師範學校、中等學校、圖書館、博物館等。

四、臺灣總督府評議會之研議

高工設置論的初登場與退場，出現在商專廢校和臺南高商成立之間，而它的重現，則是 1927 年之總督府評議會上由民間人士提出。依據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校史檔案記載，該校的創始緣起於 1927 年 10 月 3 日至 5 日，在上山滿之進總督、後藤文夫總務長官、石黑英彥文教局長等召開之第五回臺灣總督府評議會中，提出「為使實業教育徹底普及起見，應採取的方策如何？」之諮詢案。⁶² 當時與會的評議會員認為「攸關臺灣重大事項」，在「善察民意」、充分意見交換下，⁶³ 「有鑑於臺灣現狀，應及早規劃實業教育，特別是高等工業教育之普及徹底，藉以培養有智識技能的人才，促進本島實業發達，並進而向海外發展」。⁶⁴ 由此可知，本次評議會已透露出朝高等工業教育進展之意圖，且與另一議題謀求海外發展的論述結合在一起。

嗣後，議案交付特別委員會討論，旋即於相隔不到 2 週的同年 10 月 18 日，又接續召開第六回總督府評議會，相同的議案並將特別委員會的報告提交審議作成答申書。針對普及實業教育之對策，答申書開宗明義即指出，伴隨著農商產業發達，臺灣正值工業漸次勃興之際，因應工業發展現狀及洞察未來先機，工業從事者如單靠目前普通工業學校畢業程度實難以應付，至少需受過專門學校程度的教育；而現有的專門教育機構，農林商業均已齊備，唯獨欠缺工業專門學校，因此有必要選擇適當之地，新設一所與本島工業密切關連之高等工業學校。⁶⁵

至於另一項海外發展案之建議中，同樣明揭振興工業、培養人才等要務，期望充實整備工業教育機關，以圖謀向華南及南洋發展。⁶⁶ 由是觀之，設置高等工

⁶² 《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頁 1。另外，該屆評議會尚有兩個議案分別為：「對現行祭祀公業應採取之措施為何？」、「圖謀本島住民海外發展之適宜方策為何？」，參見〈第五回臺灣總督府評議會〉，《臺灣時報》1927 年 11 月號，頁 4-5。

⁶³ 李崇禮，〈督府評議會に對する感想〉，《臺灣時報》1927 年 11 月號，頁 12；〈評議會所感〉，《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10 月 8 日，第 3 版；〈總督大開言路 內地人會員亦遜讓 本島人會員得盡言 簡朗山談〉，《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10 月 8 日，夕刊第 4 版；〈評議會三案答申 此後如何施行 總督實事求是（辜顯榮談）〉，《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10 月 9 日，第 4 版。

⁶⁴ 吳昌才，〈評議會に關する感想の一片〉，《臺灣時報》1927 年 11 月號，頁 11。

⁶⁵ 〈第六回臺灣總督府評議會〉，《臺灣時報》1927 年 12 月號，頁 22-23。

⁶⁶ 〈第六回臺灣總督府評議會〉，《臺灣時報》1927 年 12 月號，頁 17-21。

業學校非單純僅是實業教育變革的問題，顯而易見地，其實與海外發展之擴張趨勢形成關連。⁶⁷ 換言之，貫穿兩次評議會的精神旨意，反映在日後成立之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的創設理念，從研議階段就已肩負著推動臺灣工業化和南進政策之雙重任務。

評議會之決議建言，可謂是高工設置論的再登場，其中也加入了向南發展論述的新元素。然而，由上述評議會的議決結果，來直接解讀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創校原委，恐為窺豹一斑而無法關照全貌。諸如總督府為何在 1927 年此時要諮詢檢討臺灣的實業教育，而評議會員之間又是如何產生設置高工之建議，且為何與海外發展之論述相互結合等問題，實有必要追本究源。此外，校方會將該評議會史事列在校史紀錄首頁，顯然與學校成立必有密切淵源及特殊意涵。因此，筆者爬梳詳閱會議及其前後相關媒體報導，試圖從官方開會目的、提案動機和會議討論內容等，進一步理解此時高工設置論的緣由與內涵。

回顧田健治郎時期復設總督府評議會共計召開 3 回，繼任的內田嘉吉則舉行 1 次之後，即未再召開，評議會員任期屆滿，亦未改選。迨至 1927 年 9 月 15 日，上山總督發佈新任命之評議會員名單，並訂 10 月 3 日起恢復召開第五回評議會，諮詢三議案也次第確定，⁶⁸ 顯示層峰思慮到評議會在裨益施政統治上之功能。⁶⁹ 對於沈寂多時而復活重生的評議會，輿論認為本次成員重用民間地方人士，且拔擢新進，異於昔制，而賦予肯定評價；⁷⁰ 相反地，臺人有識者則批評「塵封既久之總督府評議會的再開」，是「踏襲欺瞞的政策、假裝民意的機關」，指責評議會員咸係「榨取臺灣四百萬民眾的一大混合頭家」，針對恰如「支配階級俱樂部」之評議會，乃是「迴避專制惡名，假裝民意，糾集御用紳士，欺瞞大眾」，為此

⁶⁷ 林孟欣，〈日治時期的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收於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編，《成功的道路：第一屆成功大學校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33。

⁶⁸ 〈督府評議會員任命 並幹事等一齊發表 訂來月三日召集 但諮詢事項準備中〉，《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9 月 16 日，第 4 版；〈督府評議會十月三日起三日間 內定諮問事項〉，《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9 月 25 日，夕刊第 4 版。新任命評議會員 24 名當中，除高等法院長相原祐彌、內務局長豐田勝藏 2 人來自官界外，其餘 22 名均屬民間人士，其中臺、日人數各半。

⁶⁹ 〈就評議會之復活 現制度認為妥當 務為任命民間人才 上山總督談〉、〈評議會員任命 於本島進步大貢獻 後藤總務長官談〉，兩則報導見《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9 月 17 日，第 4 版。

⁷⁰ 〈詹炎錄：總督府評議會既復 全島各種議政機關 皆宜乘機根本改善〉，《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9 月 17 日，第 4 版。

提出強烈的抨擊。⁷¹

上山總督在評議會首日的開幕席上致辭曰：臺灣統治之本義在於以民族融合為中樞，期望文化與經濟並行並進，⁷² 而如此的理念實際上與 1926 年 8 月剛蒞臺上任時的訓示，略謂「臺灣統治要訣在於人民融合渾和為經，文運伸暢和產業振興為緯」，強調經濟「對外關係」以及「文教化育」之主張相呼應，⁷³ 同時也反映在此次評議會諮詢的議題上。三件議案中，除「祭祀公業」為懸案多年尚未解決之宿案外，另兩件新案「實業教育」、「海外發展」正是訴求文化、經濟並行並進的展現。

基本上，因議題皆屬重大事項，在開議前即已確立會議運作模式，亦即每一案首先說明提案理由，接著全員進行質疑問答之後，交付數人組成的特別委員會擇日另議，並以特別委員會的成案為基礎，再重新召開下回全員參與之評議會。⁷⁴ 因此，前述 10 月 18 日續開的第六回評議會，事實上僅是審議各特別委員會的討論報告，且大致無異議迅速通過，而最終之答申書也幾乎與特別委員會之報告內容雷同。⁷⁵ 是故，欲瞭解該兩回評議會，尤其本節探討有關實業教育議案和倡設高等工業學校建議的始末，若能掌握第五回會議之討論過程，以及後來參與特別委員會之會員當場發言內容加以考察分析，應可究明史實真相。

關於「實業教育」案，排定在第二案於 10 月 4 日開始諮詢，因發言踴躍，遂順延至隔日中午才由會長上山總督裁示付委，是三案中費時最長、議論最多之一案。石黑文教局長在一開始說明提案理由時，除強調實業教育之重要外，也指出現行臺灣實業教育存有若干弊端急待改革，其要點大略歸納如下：(1) 至今施

⁷¹ 以上整理自〈總督府評議會的復活 踏襲欺瞞的政策 假裝民意的機關〉，《臺灣民報》174，1927 年 9 月 18 日，第 2 版；〈塵箱より出でたる總督府評議会の再開 欺瞞政策も好加減に〉，《臺灣民報》174，1927 年 9 月 18 日，第 10 版；〈評議員の身元調査 混合重役會に過ぎず〉，《臺灣民報》175，1927 年 9 月 25 日，第 10 版。

⁷² 〈更生後の督府評議會 けふから幕を開く 劈頭上山總督の告辭〉，《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10 月 4 日，夕刊第 1 版。

⁷³ 上山君記念事業會編，《上山滿之進》（東京：成武堂，1941），上卷：傳記、詩文，頁 321-323。

⁷⁴ 〈陣容全く成った督府評議員會 けふ貴賓室で開催〉，《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10 月 3 日，第 3 版。

⁷⁵ 參見以下報導：〈督府評議會二回特別委員會 關於實業教育諮問答申案附議決定〉，《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10 月 15 日，夕刊第 4 版；〈第六回評議會 十八日督府貴賓室で開催 第一第二諮問案 委員會案通り可決〉，《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10 月 19 日，夕刊第 1 版；〈本島住民の海外發展策 委員長報告通り可決 評議會終る〉，《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10 月 19 日，第 2 版；〈第六回臺灣總督府評議會〉，《臺灣時報》1927 年 12 月號，頁 16。

行之教育缺乏配合實際生活，各級學校雖有教授實用科目相關知識，卻沒有跟上世界進步潮流，關於此，實業學校與普通學校兩者均需一併檢討，且注意切勿製造影響思想惡化之高等遊民；(2) 小公學校畢業而升學中等程度學校的人數鮮少，對於這些無法升學者的安置，有必要妥善考慮；(3) 目前臺灣實業學校僅有 5 所，無法因應本島產業需求，而且不具實業知識的人反而實際從事實業生產，如此的人數頗多，理應給予這些人社會教育或成人教育方面的指導，然而現況似乎成效有限；(4) 包括高等專門和中等程度之實業學校、實業補習學校及其科目課程等，猶需改善之處甚多；(5) 固然必須考慮本島學校和內地之間的聯繫，但也不能一味地模仿內地，應設置真正適應臺灣實際生活之學校。⁷⁶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主題「實業教育」的原意，係指「所有實業性質相關的教育」〔按：日文原文為「實業的教育」〕，不單僅限中等階段的實業學校教育，從正規的學校體系，包括普通或實業學校、初等至高等教育，乃至於社會教育等均涵蓋在內，也正因為廣義範疇的實業教育概念，在評議會員開陳意見，暢所欲言下，發言內容紛雜多元，呈現百家爭鳴之狀。

實際上，社會輿論在開議前也從廣義教育立場提出若干建言，⁷⁷ 而臺籍知識階級較側重以社會教育觀點和方式改善現今臺灣實業教育問題，⁷⁸ 惟對於高等專門教育領域之革新，幾乎無所觸及。綜觀評議會員在議程上的發言與建議，⁷⁹ 無論臺籍或日籍，大都聚焦於實業學校或實業補習學校，針對修業年限、教育內容或型態、經費等事項各抒己見，且力陳增設山林、畜牧、農業、水產、商工和礦業等多種實業教育機構之必要，而這些森羅萬象的意見最後也如實反映在特委會

⁷⁶ 〈督府評議會（第二日）〉，《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10月5日，夕刊第1版；〈督府評議會 開幕後第二日 諮詢實業教育 至上午質問截止〉，《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10月5日，第6版。

⁷⁷ 如〈詹炎錄：評議會三諮詢案（上） 願官民慎重研究〉，《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10月1日，夕刊第4版；〈三つの評議會諮詢案 特に實業的教育について〉，《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10月4日，第2版。

⁷⁸ 〈對諮詢案大體意見 本島人智識階級間〉，《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10月4日，第4版。

⁷⁹ 以下有關會員發言內容無特別加註者，均整理自如下報導：〈督府評議會（第二日）〉，《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10月5日，夕刊第1版；〈督府評議會 開幕後第二日 諮詢實業教育 至上午質問截止〉，《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10月5日，第6版；〈評議會第二日 入替り立替り 意見を述べ 實業的教育振興諮詢案 今日に持越す〉，《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10月5日，第2版；〈督府評議會（第三日） 實業教育に關し 引續き質問續出 第二諮詢案討議終了〉，《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10月6日，夕刊第1版；〈評議會第二日 實業教育普及徹底 下午續開討論未盡 再延長第三日上午〉，《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10月6日，夕刊第4版；〈評議會第三日 實業教育案附託委員 正午討論完畢〉，《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10月6日，第4版。

報告以及第六回答申書中。

另外，會議上也出現殊異之意見，其一為訴求初等教育的義務化；其二為涉及高等教育之變革。相對於前者如黃欣、黃純青、簡朗山等臺籍會員的見解，⁸⁰ 將視野擴及高等教育範疇之後者則全是日籍會員的主張。松岡富雄即指出目前除水產學校外，臺灣的實業學校業已足夠，無須再設，反而是高等工業學校有設立之必要；松岡認為實業教育並非「虛業教育」，徒增就學人數並無法真正振興產業，期望應造就實際參與勞動之人才，也藉此導正接受實業教育者不從事實業生產卻趨於官廳或其他俸給生活之社會現象或思想。松岡進一步強調振興工業乃現狀最為緊要之事，雖然臺灣缺乏工業原料，惟近鄰富有資源，將之運至臺灣而興工業，應非難事；欲振興工業，設置工業學校固屬需要，然設立高等工業學校亦必要，且現階段講求企業移民華南南洋之際，除資本外，培育具有相當素養的人才更是當務之急。

此外，鈴木重臣主張將新設臺灣大學計畫之經費，移撥部分挹注於增設適應地方實情的簡易實業學校，對於在臺灣設置大學及其學科一事，促請當局應再三慎重考慮為宜。又，坂本素魯哉也認為現在無設立高等專門以上學校之需要，本島已有高等商業學校二所，此後若再增設高等工業學校，則更沒有理由設立上級學校之必要。基本上，2人針對翌年即將創校成立的臺北帝國大學，其適切與否，仍深具存疑之看法。⁸¹ 由此亦可知，松岡等此派高等教育改革論者，站在以實業教育為重的殖民教育觀點與立場，實業專門學校乃是他們可以接受的最高學校位階上限，至於如內地之單科大學或普通教育領域之帝國大學，顯然是抱持消極、否定的態度。

其中，不容忽視的是，上述松岡富雄所提出之論點：(1) 實業教育宜採菁英方式，重質不重量；(2) 明示工業教育的時代重要性，倡議設置高等工業學校；(3) 從工業原料、資本以及人才培養等方面，將見解延伸訴諸南方發展論述。而會後松岡被指名擔任本案特別委員會委員之一，⁸² 其主張也反映在特委會報告

⁸⁰ 〈評議會雜聞〉，《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10月6日，夕刊第4版；〈公人言論要公平 採納與否在當局（黃欣氏談）〉，《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10月9日，第4版。

⁸¹ 〈評議會雜錄〉，《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10月6日，第2版。

⁸² 會後被指派擔任該案特別委員會之委員有：石黑英彥文教局長、吳昌才、黃純青、松岡富雄、李崇禮、荒卷鐵之助、平山寅次郎等7人。

和最終答申書中，由此可推知松岡之意見普遍為會員所接納。因此，經由評議會議決產生之高工設立說，進而與謀求海外發展論相互結合之建議，松岡富雄實為重要的倡議發端者。

然而，為何松岡有如此的思維，若考察其個人背景資歷，即可略知一二。松岡富雄⁸³ 生於 1870 年，九州熊本縣人，1903 年渡臺應聘擔任臨時臺灣糖務局囑託，幸獲新渡戶稻造知遇，由一小職員漸於臺灣實業界嶄露頭角。退職後除投入中部一帶甘蔗苗圃之栽培事業外，⁸⁴ 也先後參與投資設立松岡、帝國、新竹等多家製糖會社，1917 年擔任臺灣新聞社社長，且歷任海南製粉、臺灣製紙、臺灣製麻等公司董事要津，並自創「松岡拓殖合資會社」，⁸⁵ 1920 年被選任臺中州協議會員，隔年被任命為總督府評議會員，其多角化經營和豐沛人脈，橫跨臺灣糖界、商界、新聞界與政界，被喻為「天才型事業家」、「糖業界恩人」或「中部言論界主將」。同時，松岡亦是「南洋發展的主唱者」，1912 年起將事業觸角延伸至華南南洋，積極致力於向南發展，⁸⁶ 1917 年至 1919 年間合資「南洋開發組合」（英屬婆羅洲），又自創「比律賓拓殖」、「比律賓產業」以及「松岡興業」等株式會

⁸³ 有關松岡富雄個人檔案，整理自橋本白水，《評論臺灣之官民》（臺北：南國出版協會，1924），頁 15；橋本白水，《臺灣的事業界と人物》（臺北：南國出版協會，1928），頁 463；田中一二，《臺灣的新人舊人》（臺北：臺灣通信社，1928），頁 235-244；橋本白水，《臺灣統治と其功勞者》（臺北：南國出版協會，1930），頁 27-28；吉田寅太郎（吉田靜堂），《續財界人の横顔》（臺北：經濟春秋社，1933），頁 18-22；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頁 345 等。另外，關於松岡之海外事業，可參見鍾淑敏，〈臺灣總督府的「南支南洋」政策：以事業補助為中心〉，《臺大歷史學報》34（2004 年 12 月），頁 164-167。

⁸⁴ 據報紙記載，松岡看準蔗苗市場，於 1911 年成立松岡蔗苗養成場，並派員遠赴爪哇調查研究，可謂本島蔗商事業之開山鼻祖，見〈糖業視察記（二） 中壠にて みやかは生 松岡蔗苗養成場〉，《臺灣日日新報》，1914 年 4 月 12 日，第 4 版。

⁸⁵ 松岡拓殖合資會社創立於 1915 年，經營桃竹苗地區高地蔗苗及臺中一帶開墾事業，〈松岡拓殖計畫〉，《臺灣日日新報》，1915 年 3 月 31 日，第 2 版。此外，松岡將自營事業本社設在臺灣者，島內以「松岡拓殖合資會社」為主，海外則以「比律賓產業株式會社」為基地，拓展業務，兩者社址皆登錄於臺中市頂橋子頭，營業項目前者有蔗苗養成、製糖販賣、開墾石油採掘、運輸等，資本額 38 萬圓；後者包括菲律賓群島的麻、椰子及其他農作物、農產物之買賣和開墾拓殖事業，資本額 30 萬圓。參見鈴木辰三，《臺灣文官武官民間職員錄》（臺北：臺灣文官武官民間職員錄發行所，1930），頁 203。

⁸⁶ 1912 年起，松岡或派部下或親自，有時隨新渡戶稻造赴菲律賓、爪哇等南洋各地研究調查，並發表其南洋經驗，參見以下報導：〈比島的事業經營〉，《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 11 月 20 日，第 1 版；〈比島事業經營〉，《臺灣日日新報》，1913 年 10 月 22 日，第 1 版；〈松岡氏南洋事業〉，《臺灣日日新報》，1916 年 9 月 20 日，第 2 版；〈比島事業著目〉，《臺灣日日新報》，1917 年 1 月 9 日，第 1 版等。又，松岡之南洋經驗談可見〈南洋視察談：比島的經濟的價值〉，《臺灣時報》1913 年 11 月號，頁 43-47；〈南洋視察談（承前）：比島的經濟的價值〉，《臺灣時報》1913 年 12 月號，頁 42-47。

社（均在菲律賓），對南進主義展現雄心萬丈之企圖。

由上可知，拜第一次世界大戰景氣所賜，松岡成為大正南進時期極為活躍的人物，儘管一次戰後陷入全球經濟低迷，日本南進熱潮逐漸冷卻消褪，但松岡仍憑藉其南方實踐所累積之豐富經歷，加上初期在臺參與改良糖廩為新式工廠的製糖會社、投資天然瓦斯和石油開採以及其他眾多製造業之體驗，在面臨臺灣工業發展起飛之際，其蓄勢待發所導引匯集而出的上述松岡理論，可謂深切著明。另外，同樣在臺灣中部深具影響力的坂本素魯哉，不僅是松岡的事業伙伴，⁸⁷ 也是小白球友，⁸⁸ 兩人交情匪淺，對於松岡之設立高工意見，坂本會附和其說，亦不難想像。要之，此時評議會的高工設立建議，由民間提出的高工設置論，明顯反映著在臺日人階層對臺灣實業教育要求改革之呼聲。

五、設校構想之政策化

1927年10月五、六兩回總督府評議會所研議的設立高工意見，於翌年1928年7月正式由石黑文教局長提出官方設校計畫。期間因發生臺中不敬事件，導致上山總督引咎辭職，⁸⁹ 再改換由當時執政黨立憲政友會系之川村竹治繼任臺灣總督。川村重視臺灣工業發展，除將高工設置構想付諸具體政策推動外；⁹⁰ 同時在1929年1月8、9日召開第七回總督府評議會，諮詢「本島產業，特別是工業振

⁸⁷ 坂本與松岡同在一家公司擔任要職者，有臺灣製紙、臺灣製麻、海南製粉、新竹製糖等會社，見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頁158；鈴木辰三，《臺灣文官武官民間職員錄》，頁30、191、199。其中以海南製粉為例，1927年時任董事之松岡與社長之坂本，2人持股數分別排名第4和第6位，參見海南製粉株式會社，《第拾五回營業報告書：昭和元年下半期》（基隆：自刊本，1927）；海南製粉株式會社，〈株主名簿（昭和元年12月31日現在）〉（基隆：自刊本，1927）。

⁸⁸ 臺灣的高爾夫球運動肇始於1918年，由松岡富雄自菲律賓引進，因此松岡素有「臺灣高爾夫元祖」之稱，而松岡與坂本均是日治時期臺灣高爾夫會員，坂本亦擔任中部臺灣高爾夫俱樂部理事長，參見田中一二，《臺灣的新人舊人》，頁196；周明德，〈臺灣第一座高爾夫球場七十年回顧：臺灣高爾夫俱樂部簡史〉，《臺北文獻》直字93（1990年9月），頁102-103。

⁸⁹ 有關1928年5月14日發生之臺中不敬事件，參見鷺巢敦哉，《臺灣警察四十年史話》（臺北：自刊本，1938），頁81-83；上山君記念事業會編，《上山滿之進》，上卷：傳記、詩文，頁375-378。

⁹⁰ 固然作為諮詢機構之總督府評議會無主導政策功能，但從日後1929年7月臺南高等工業學校預算曾一度遭受頓挫時的報導可知，文教局就說明高工設校構想乃上山總督時代依評議會意見而推動之宿案，重視臺灣工業化的川村贊同並延續此計畫，參見〈復活要望の走り 臺南『高工』を提ぐ 政黨派に超越した大問題として 當局と力を併せ實現を期す〉，《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7月19日，第7版。附帶說明：上述預算之中挫，也是受到內地政黨輪替之影響。

興方案」議題，而該回答申書中也再度強調成立高等工業學校之必要。⁹¹

在設校構想政策化過程中，有關校址地點之選定牽涉廣泛且複雜的現實問題。汪知亭在論述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成立原因，舉出其背景為配合大高雄港建築需要及南部工業區建設計畫，以支援南進政策，⁹² 這點亦說明在臺南設校有其地緣關係上的考量。但是，關於高等工業學校在臺南設立的根本主因，乃涉及專門教育機關的調整，亦即撤廢臺南高商改立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之政策決定。

根據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校史檔案記載，1928年7月官方提議設立高等工業學校之際，基於當時「本島已有高等商業學校二校（臺北高商、臺南高商），輿論強烈表示實在太多，無此需要」之理由，總督府當局也在同樣見解下，決定將其中之一的臺南高商廢校，另新設一所高等工業學校。此項意見獲得第五十六回日本國會支持，順利通過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創設準備費及新校舍營建費用之預算編列。⁹³ 針對1926年剛創校未滿3年之臺南高商所作的專門教育機關廢立調整，川村竹治亦解釋：

島內高等商業學校二校，似乎在人才消化上有困難，故將其中之一變更為高等工業學校。此舉在農本主義的臺灣，得以更進一步謀求工業發展，不只島內工業可以自給，亦可試圖在華南、南洋地區活躍，這是對帝國臺灣所期待的重大使命。……將高商變更為高工雖屬極為細微之事，而且臺南高商創校以來沒有經過多少歲月，尚未有畢業生就變更，多少讓世人震驚，但總之，這是發展工業的豫備計畫。毫無工業技術或基礎，僅徒費培養商業人才，而欲以空手策劃海外發展，吾人認為實在勉強且難獲致成效。⁹⁴（筆者譯）

⁹¹ 〈督府第七回評議會 議事日程八九兩日 詰問本島產業 特如工業方策如何〉，《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1月8日，第4版；〈總督府評議會 八日府內會議室に開催 議案は「工業振興策」〉，《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1月8日，第7版；〈本島工業振興策 總督府評議會の答申〉，《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1月10日，第2版。

⁹² 汪知亭，《臺灣教育史料新編》，頁142。

⁹³ 《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頁1-2；若槻道隆，〈臺南高等工業學校の開校に當りて〉，頁1-2。

⁹⁴ 川村竹治，《臺灣の一年》，頁41-42。

由此可知，為推展工業化和圖謀海外南進發展，總督府以輿論為後援，凸顯高等商業學校過剩之矛盾現象，藉創設高等工業學校之由，採取廢舊立新的方式以重新調整臺灣的專門教育體制。然而，假如細探當局決策原委，沒有採取兩立，亦即另再別設高工而非廢臺南高商不可之真正理由為何？且廢校對象為何不是臺北高商而是臺南高商？縱然須裁撤一所高商，最終高工也未必一定要設在臺南。此外，高商變更為高工之作法，果真如川村所說「極為細微」小事？地方輿情民意，尤其臺南高商師生家長反應如何？而面對「世人震驚」之舉，總督府又是如何對應？圍繞著為設高工而引發專校廢立調整、設校地點議論等問題，正顯示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之成立充滿極其複雜的一面。以下就當時的輿論反映以及官民互動關係，來考察其決策過程和背後關連的因素。

針對總督府採取之專校調整政策，日方媒體咸表贊同，回顧商專與臺南高商興廢歷程，重提叢爾小島無須二所高商之舊論，「遠瞻本島產業前途」，為臺灣工業化新設高工而將向來招生困難、就業不易，被喻為「本島學制之癌」的高商整理縮減為一校，由大局觀之，認為正合時宜，頗具意義。⁹⁵ 當時社論亦指出由農業朝向工業轉型發展的臺灣，除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等低廉動力外，培育工業人才養成機關無疑是必須條件，伴隨時勢變化和推移，從「財政上理由」而言，二所高商再加一所高工勢必營運困難，故廢一高商改設高工乃是不得已的措施。⁹⁶

相對於此，臺人有識者則為文痛批當局民族偏見的政策心態，雖說為建設工業臺灣而設立高工言之成理，但因此而廢止承繼臺灣人本位傳統的臺南高商，令人無法接受。該文指責今日會造成南北二校高商陷入就職競爭窘境，實導源於差別教育，警告官方果真膽敢廢校，表明此舉是「向本島人挑戰」；對於年經費 40 萬圓左右之高商支出，應非難事，何況一億數千萬圓經費中的九成均是臺灣人負擔，強調假若如此明顯地拒絕臺灣人的教育，「我等將斷然無法沈默」。⁹⁷

⁹⁵ 〈臺南高商を廢止し 「高等工業」を新設 工業の臺灣へ轉向の一施設 來年度に豫算を計上〉，《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9月25日，第2版。

⁹⁶ 〈高等工業學校の設置 工業臺灣の出現に必須條件〉，《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9月26日，第2版。

⁹⁷ 〈高工か高商か 問題は民族偏見〉，《臺灣民報》229，1928年10月7日，第10版。

另外，尚有社會輿論一方面對棲身於破舊腐朽之商專校舍、新校地仍未覓定，且預算因議會解散而不成立，今又遭逢廢校黯淡命運的「日本第一受難學校」臺南高商寄予同情；另一方面也針對此後臺南高商教師面臨失業，以及新設高工之校址選定等問題，提出中肯建言，促請當局深思熟慮為宜。文中說明高工、高商性質全然迥異，廢校後臺南高商教員並無法悉數直接轉任新設的高工，不像同年春季臺北高等農林學校併入臺北帝國大學成為專門部時，處理上來得順遂，恐因而引發如內地學校教授煽動學生之類的非法情事。至於有關高工設校位址，當局為避免重蹈臺南高商倉促成立之覆轍，乃規劃有 2 年多的籌備時間，惟預算高達 250 萬圓，且比起內地 30 餘所高工毫不遜色之宏偉新校，其校址擇定何處，早晚必將成為焦點。該篇報導當時眾家主張說法，略謂：以代替臺南高商之見解而論，理應選擇設在臺南；若從日月潭水力發電復工之副產物而言，臺中實為最佳地點，尤其新設高工一直是臺中地方年來之素願；但換另一角度考慮，日月潭工程最受恩惠是臺中，站在利益均霑原則，亦有認為本島工業地帶的南部較恰當；若再按學校本身生活層面觀之，則又有建議以最便利的臺北更適合。⁹⁸

上述北、中、南三處設校地點之立論，顯見背後各地勢力爭相競逐的景況，其中所謂「臺中地方年來之素願」，隱約可推知前述總督府評議會倡議附和高工設置論之松岡富雄、坂本素魯哉等臺中地方派系發揮影響力。事實上，川村總督在 1928 年 9 月初次返國述職歸臺的記者會上，即已透露因廢止臺南高商，故高工新校擬定設在臺南，⁹⁹ 此交換條件之聲明不僅宣告將早先末松所提議的高工設置案具體付諸實現，同時也正符合總督府重視南北地域平衡發展之原則。

然而，對於臺南設校決策，當時支持臺南高商存續運動的在地市民則強烈表達質疑，追究伊澤總督時代官方拒絕履行末松諾言，曾以臺南缺乏工業學校基礎、中央研究所位於臺北，以及教授師資和經費關係、水質地質調查等等諸多理

⁹⁸ 詳見以下報導：〈誕生前も誕生後もつき纏ふ暗い影 建築費にも敷地にもまだありつけぬ 受難の臺南高商（上）〉，《臺灣日日新報》，1928 年 9 月 26 日，第 2 版；〈一寸面倒な教授の身賣 廢校の報に驚愕した學校當局 受難の臺南高商（中）〉，《臺灣日日新報》，1928 年 9 月 27 日，第 2 版；〈高工建設地が今から頭痛の種 各方面から引張風とならう 受難の臺南高商（下）〉，《臺灣日日新報》，1928 年 9 月 28 日，第 2 版。

⁹⁹ 〈お手のうちの鮮かさ一初上京にもり澤山なおみやげ 昨日歸北の車中記者團を迎へて 晴れやかに語る總督〉，《臺灣日日新報》，1928 年 9 月 28 日，第 2 版。

由，認定臺南不適合設置高工始成立高商，今日卻出爾反爾，甚至扼殺「收容臺人子弟為特色」之臺南高商，而需愚痴等待未可預知的高工，面對如此草率無理的政策，呼籲市民勿被輕易欺騙。¹⁰⁰

固然當局擇定臺南作為新設高工校址，但不利臺南設校之說法依然普遍存在，各方勢力爭奪角逐情形亦未見銷聲匿跡。例如 1928 年底，石黑文教局長南下蒞臨臺南高商訓示後，轉往臺南州廳召見地方重要官民，就說明高工預定設於臺南市，校地約 3 萬坪，希望市民急募捐獻，因為臺北、臺中地方人士現在都積極爭取在該地設置。石黑進一步表示臺南市向來沒有高工的基礎條件，不利因素頗多，不如擁有中央研究所、工業學校之臺北來得優勢，因此擬先設立一種工業補習學校作為基礎，以利 1931 年正式成立高工。¹⁰¹ 縱使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創設前一年，關於設校地點的議論猶見報章媒體，認為工業養成首重實習，故高工應設在產官學工業部門機關匯聚的臺北較適合；反觀高商，為圖謀南進發展，無論就學科性質或氣候、地理位置等各方面，宜設於臺南為佳，因此建請當局重新研究評估兩校對調，亦即高工在北、高商在南，「以取其均衡」之效。¹⁰²

由上可知，工業基礎條件似顯薄弱的臺南市原本並非設置高工之絕佳地點，最終得以脫穎而出，基本上乃是財政理由下犧牲臺南高商換來的代價結果。除此之外，值得注目的是，臺南地方政府的態度以及市民輿情動向亦是不容忽視的背後助力。回溯前面述及 1922 年商專升格運動，輿論對於地方官憲未盡上意下達督導之責頗有微詞，俟 1925 年新設高商運動再起，臺南州市當局一改前例，態度轉趨積極介入，不只壓制日臺運動有志者籌組期成同盟會，並勸阻北上請願行動，同時協議所有陳情事宜委由州知事全權代行處理。¹⁰³ 而此次總督府設立高工計畫，臺南地方政府則更進一步主動爭取在地設校，1928 年 12 月 24 日臺南州知事行文總督，表明願意收購約 4 萬 7 千坪市地捐贈國庫以為新校用地，同年 12

¹⁰⁰ 〈高工は果して臺南に設置するか？市民は騙まされるな！一臺南市民〉，《臺灣民報》233，1928 年 11 月 4 日，第 11 版。

¹⁰¹ 〈臺南高商的廢止確定 由石黑局長到校宣告 學生們的血判狀發出了〉，《臺灣民報》241，1929 年 1 月 1 日，第 8 版。

¹⁰² 〈對臺南設立高工管見 為宜與臺北高商對調〉，《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1 月 6 日，第 4 版。

¹⁰³ 〈高商問題協議 知事に一任す〉，《臺南新報》，1925 年 7 月 13 日，第 2 版；〈臺南高商運動成行 物々しい期成運動などはやめて 慎重に督府の諒解を得るが良策〉，《臺南新報》，1925 年 7 月 14 日，第 2 版。

月 28 日文教局長函覆諭知新建高工預定設於臺南市，盼州方提供之校地經整地後捐贈國庫。¹⁰⁴ 臺南州當局極力向總督府運作示意，不惜購地捐贈，釋出善意舉措，無可諱言，實為促成在臺南設校確立定案的重要推手。

臺南地方政府前後會有如此相異的對應態度，或許與總督更替牽連地方主管人事異動，¹⁰⁵ 以及面對性質不同之市民運動不無關係。1922 年的商專升格運動是以臺人為主體，時任臺南州知事的吉岡荒造，雖曾面見臺籍陳情者聽取意見，惟僅只照會總督府並靜候上級回覆以為因應，¹⁰⁶ 態度明顯較為消極。而 1925 年的新設高商運動，則係日臺聯合之市民請願運動，性質層次已非同日而語，從上列報導以及喜多孝治知事、甚至荒卷鐵之助市尹也北上總督府報告說明，可見當時州、市政府積極介入協調之態勢。至於 1928 年底以捐獻校地的具體行動表達支持高工設校計畫，時任知事的片山三郎，正是前述主張「加工貿易立島論」之前任殖產局長，其轉折變化由此亦可推測得知。

再則，有關在地民情部分，初期面對當局欲裁撤臺南高商代之校址尚未明確的新設高工，臺南市民多人希望存續臺南高商至少 2、3 屆畢業生，而該校學生也開始出現焦躁不安的情緒。¹⁰⁷ 待川村總督發表交換條件聲明後，情勢明顯產生變化，一般民眾轉而伺候觀望，反之學生及家長則掀起反對廢校運動日漸白熱化。¹⁰⁸ 根據當時媒體報導，臺南高商存續運動僅在學生與家長之間沸騰，一般市民和學校當局保持靜觀其變的態度，運動未見向外擴展；¹⁰⁹ 甚至到 1928 年末政策益趨明朗之際，部分市民轉而贊同、歡迎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設置計畫。¹¹⁰ 試

¹⁰⁴ 《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頁 2。

¹⁰⁵ 有關文官總督時期，伴隨臺灣總督更迭下的地方官吏人事異動與佈局，參見岡本真希子，《植民地官僚の政治史：朝鮮・台湾總督府と帝国日本》（東京：三元社，2008），頁 338-366。

¹⁰⁶ 〈臺灣商專問題〉，《臺南新報》，1922 年 2 月 20 日，第 5 版；〈商專問題說明 吉岡知事より〉，《臺南新報》，1922 年 2 月 23 日，第 2 版。

¹⁰⁷ 〈臺南高商學生廢校噂に動搖 學校當局は慰撫に勉め居るも 父兄側に反對氣勢〉，《臺灣日日新報》，1928 年 9 月 27 日，第 5 版。

¹⁰⁸ 〈廢校の噂に蹶起する學生 反對具體運動に移らんとす〉，《臺灣日日新報》，1928 年 10 月 13 日，第 5 版；〈臺南高商問題 學生は父兄と共存續運動に猛進するに決す〉，《臺灣日日新報》，1928 年 10 月 14 日，第 5 版。

¹⁰⁹ 〈臺南高商存置を父兄から陳情 其他積極運動開始〉，《臺灣日日新報》，1928 年 10 月 21 日，夕刊第 2 版。

¹¹⁰ 〈「工業化」への戦士を作る 臺南高工具體化す 來年度に新營費を計上 臺南高商は廢校とする〉，《臺灣日日新報》，1928 年 12 月 14 日，第 2 版。

想當年發起全民運動竭力爭取，延頸企踵又曲折難產的臺南高商，如今卻將慘遭廢校厄運，但從上述地方民情轉變以及冷漠態度觀之，正顯示臺南高商新設運動時所蘊涵的侷限性，這不單只是所謂「向本島人挑戰」之日臺族群的對立矛盾，更反映著與臺南高商有無直接關係之市民社群的利益衝突。

換言之，以絕大部分的臺南市民而言，高商高工均屬專門學校，在等價條件交換之前提下，此時的專校廢立調整是可以接受的政策安排，一來並不影響在地子弟的升學權益；二來依然維持南北地域平衡原則，既不失「全臺首學」之教育傳統，也無損於古都的「繁榮與面子」，因此對於臺南高商廢校措施，不認為是嚴重且深刻的問題。非臺南高商學生或家長之其他一般市民，會冷眼旁觀看待存續運動，進而轉向支持當局改設高工之既定政策，平心而論，是可以理解的。誠如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在籌備時，任職總督府學務課長之若槻道隆提及，當臺南高商決議被廢止，在地民眾轉而熱烈期待高工，加上因鄰近工業地帶高雄，且臺南又是臺灣文化發祥地，當局乃確定臺南設校決策。¹¹¹ 又如創校後臺南市尹古澤勝之曾指出，當年臺南高商被裁撤併入臺北高商，臺南市民失望之情表露無遺，因此當總督府提議成立高等工業學校，市民殷切盼望在地設校，其開心見誠之懇求，終獲當局首肯。¹¹² 再譬如就讀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機械工學科第 2 期的里見文義，回憶中學時候臺南民眾發起設立高工勸誘運動，而當時擔任市協議會員的父親里見四郎亦參與其中。¹¹³ 是故，面對彼時民意如此期待高工，冷靜坐視高商存續運動，難怪臺人有識者不禁要怨嘆臺南市民對教育漠不關心。¹¹⁴

至於反對廢校運動方面，「斷然無法沈默」的非僅臺籍人士，成員主要以臺南高商學生及家長為核心，並聯合若干教職員、商專畢業校友和當年推動設校運動之部分日臺有志者。具體而言，臺南地區代表有津田毅一（律師，曾任臺南廳

¹¹¹ 伊形德一，《碌々四十年》（東京：東宣出版，1979），頁 50。

¹¹² 古澤勝之於 1934 年 3 月 15 日臺南高等工業學校開校祝賀式上的〈祝辭〉，收於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校友會編，《龍舌蘭：開校祝賀式記念號》（臺南：該會學藝部，1934），頁 15。

¹¹³ 里見文義，〈凡愚のたわごと〉，收於台南高等工業学校同窓会編，《鳳木会会報特別号：六十周年記念》（横浜：開校六十周年記念事業企画委員会，1991），頁 116。里見文義的父親里見四郎，為臺南在地的開業醫師，也是地方知名聞人。參見橋本白水，《評論臺灣之官民》，頁 34；橋本白水，《臺灣の事業界と人物》，頁 518；田中一二，《臺灣の新人舊人》，頁 488。

¹¹⁴ 〈臺南高商的廢止確定 由石黑局長到校宣告 學生們的血判狀發出了〉，《臺灣民報》241，1929 年 1 月 1 日，第 8 版。

長及數屆總督府評議會員)、村上玉吉(臺南商工會幹部)、相良吉彌(臺灣新聞社臺南支局長,筆名風舟)、石秀芳(錦榮發吳服商)、陳瑞山(煙草經銷商);臺中地區則有中津德治(彰化銀行要員)、安田稻實(醫生,亦為海南製粉第三大股東)等,大抵上皆具地方州或市協議會員身份之政商名流。¹¹⁵ 他們一方面召開父兄有志大會,痛陳當局輕視青年教育,強調臺南高商確實與臺北高商有殊異之處,且和高工設立問題並不互相衝突,毅然提出存續主張的請願;¹¹⁶ 另一方面學生也投書媒體,譴責總督府經費縮減論之矛盾,對於農業立國或工業立國無定見、無方針的混亂政策,公開質疑和抨擊,¹¹⁷ 同時改組強化學生運動組織,積極訴諸公意,¹¹⁸ 校園內師生之焦慮及騷動,瀰漫著詭譎莫測的氛圍。¹¹⁹

雖然該運動看似日臺再度結合的聯手行動,但實際上在缺乏全民共識與有力後援之情況下,單憑臺南高商關係者孤軍奮戰而難敵當局既定方針時勢所趨,加諸臺南市民滿足於以高工作為交換條件,對於臺南高商廢校問題頗形冷淡,反對廢校運動遂被迫瓦解而漸歸式微。¹²⁰ 儘管嗣後石黑文教局長特意南下蒞校訓示,學生態度突然轉趨惡化,並引發軟硬兩派決裂,¹²¹ 甚至遞出血書以表明志,惟終究無法挽回廢校命運。此後近三個月,為在校生未來去留善後處理對策,另

¹¹⁵ 組織成員彙整自當時報刊記載,代表人物職銜參考前引日治時期有關人物介紹書籍,其中津田、村上、石秀芳等曾參加當年臺南高商設校運動。另外,依據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商業學校編,《臺北高等商業學校一覽:昭和五年度》(臺北:該校,1930),頁67-86,在校生與畢業生名冊及其他相關資料,相良吉彌之子相良謙吉,臺南一中畢,1926年9月入學首屆臺南高商(《臺灣總督府府報》,1926年9月4日,頁4);中津德治長男中津秀雄,臺中二中畢,1927年4月考入臺南高商(《臺灣總督府府報》,1927年4月14日,頁64);安田稻實次子安田實,臺中二中畢,1928年4月考取臺南高商(《臺灣總督府府報》,1928年4月19日,頁76),以上代表人物均與臺南高商有關。

¹¹⁶ 〈臺南高商存置を總督へ陳情 代表者二名廿二日出北 津田氏と共に總督訪問〉,《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0月23日,夕刊第1版;〈臺南高商父兄大會 先派代表提出陳情書 或者再到中央運動存置〉,《臺灣民報》232,1928年10月28日,第4版。

¹¹⁷ 〈公開欄:臺南高商存廢問題 敢て公平なる識者に訴ふ 一學生〉,《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2月5日,夕刊第3版。

¹¹⁸ 〈臺南高商運動又猛烈 當局何苦禁止辯論會 高商廢止是市民的大恥!〉,《臺灣民報》239,1928年12月16日,第2版。

¹¹⁹ 〈臺南高商廢校の報道に對し 興奮した加藤校長語る〉,《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2月15日,第5版。

¹²⁰ 〈臺南高商廢校問題:學生側は大勢と環境に鑑み 涙を吞んで反對運動を捨てる〉,《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2月18日,第5版。

¹²¹ 〈石黑局長の廢校訓示と學生の態度〉、〈學生中に硬軟二派決裂 態度一致せず〉、〈大勢上止むを得ない 廢校問題觀〉,三則報導見《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2月25日,第5版。

外又衍生校內意見分歧對立，也導致與臺北高商之間掀起護校爭論和筆戰。¹²²

總督府專校廢舊立新的計畫構想得以具體付諸施行，其關鍵之決戰舞臺猶在於日本國內的議會預算審議。1929年2月8日第五十六回帝國議會眾議院審查大藏省預算，出身大藏省官僚、隸屬在野的立憲民政黨議員田昌，¹²³ 相當在意臺灣高等專門學校日臺就學人數比例，尤其日籍學生當中在臺日人和內地人之比重，認為在臺灣財政歲入不敷的情況下，不宜濫設專收內地子弟的學校；而1926年成立伊始之臺南高商現在卻要廢校，質疑有朝令夕改之嫌，也凸顯前朝政策的錯誤；另針對來年度編列預算之高工，詢問其設校地點。列席的總督府總務長官河原田稼吉則回答表示：臺灣高等專門學校仍以在臺日人居多，其中臺南高商招生入學狀況欠佳，量不足而質低劣，故考慮臺灣的高等商業教育只維持臺北高商一校即可，況且當今臺灣工業發展日益受到關注，輿論各界呼籲希望成立工業教育設施，有鑑於此，「將容忍之事物加以整理」，「在財政及其他方面作適當安排」，乃決定廢止臺南高商並新設高工於臺南。¹²⁴

從上述國會議員質詢以及府方官員應答內容，可窺知雙方對此議案的觀點與立場。田議員之見解恰如當年法制局反對成立臺南高商，簡言之，內地中央府會側重殖民地整體教育制度結構性的問題，新設專門學校主要招生和教育對象係在臺日人子弟，而非收容內地過剩學生，以培育經營殖民地和南進策略人才。至於

¹²² 參見以下報導：〈臺南高商廢校善後協議 きのふ同校父兄の間に〉，《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2月26日，第3版；〈合併か分校か 臺南高商の善後 生徒及父兄の意思を尊重して決定する〉，《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1月12日，第2版；〈廢校の運命を負ふ臺南高商の歸趨 分校か合併かに就いては 校內では臺北に合併希望多く 委員を挙げ促進に勉む〉，《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1月29日，第5版；〈臺南高商は結局合併か 臺北高商側は分校を主張 しかし大勢は合併へ〉，《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2月14日，第7版；〈公開欄：臺南高商問題に就て 同情生〉，《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2月20日，夕刊第3版；〈公開欄：臺北高商生諸君に與ふ 反駁生〉，《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2月23日，夕刊第3版；〈合併か分校か 痺れが切れる臺南高商善後策 學生も職員もその歸趨に迷ひ 當局の方針決定を要望してゐる〉，《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2月26日，第5版等。

¹²³ 田昌（1878-1943）與臺灣尚有淵源，為田健治郎兄田艇吉之長男，歷任大藏省駐海外財務官及營繕管財局長、臺灣銀行調查會委員、大藏次官（1924.8/12-1927.4/22）等職，之後分別於1928年2月、1930年2月當選第16回和第17回眾議院議員，1931年回省擔任大藏政務次官（1931.4/15-1931.12/15）。參見吳文星等主編，《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頁39、588；秦郁彥編，《日本官僚制総合事典1868-2000》（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1），頁32-33；〈ザ・選挙〉，下載日期：2010年3月20日，網址：http://www.senkyo.janjan.jp/election/1930/99/008436/00008436_23251.html。

¹²⁴ 〈第五十六回帝國議會眾議院豫算委員第三分科（大藏省所管）會議錄（速記）第四回〉，收於眾議院編，《帝國議會眾議院委員會會議錄・昭和篇9：第56回議會》（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0），頁45-46。

河原田之說明，亦清楚陳述了臺灣現行專校體制亟待改革，以及總督府礙於財政因素而擘畫此政策的真正原由與意圖。

眾議院是日通過審議後，於同年 3 月 2 日貴族院審查總督府年度特別會計預算，在歲出部分的多項新規劃事業中，河原田一開始就提到目前臺灣欠缺工業方面之高等教育機關，因此擬創設高等工業學校。但該委員會答詢幾乎聚焦於臺灣電力株式會社以及日月潭發電工程，冗長的討論甚至順延到 3 月 5 日的續開會議，始無異議通過包括設立高工之所有預算。¹²⁵ 國會預算審議的通過，意味著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立校定案，也注定臺南高商廢校成局，總督府一方面協助法制局制訂臺南高商廢止官制；另一方面著手準備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籌設事宜。¹²⁶ 1929 年 3 月 16 日，臺南高商正式被裁撤併入臺北高商改為臺南分教場，¹²⁷ 從而結束其在日治臺灣教育發展史上短暫而苦難的校運。

概觀本節論述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設校政策經緯，綜上得知，總督府為設置高工而採取廢舊立新措施，不僅顯示總督更迭下殖民教育政策之混亂，也反映當局在財政經費方面所作的思慮衡量。在存廢取捨之間，輿論雖有高商、高工南北對調之說，但未言及裁撤臺北高商，畢竟臺北高商自創校以來即是以日本人為本位之學校，總督府不可能「自廢武功」，因此體質脆弱、校齡尚淺而招生不易的臺南高商遂成為廢校對象，也以此作為交換條件，將高工設校於臺南。另外，面對官方政策決定，民情動向亦呈現頗為弔詭之現象，贊同或否定的矛盾衝突非只顯露在日臺族群間，也存在於與臺南高商有無直接關係的市民社群之中。

然而，所謂臺南高商之脆弱性以及財政因素究竟為何，從 1929 年 3 月總督府提報內閣會議廢止官制的相關資料，亦可略知其要。一如河原田在眾議院上之詢答，該公文陳述理由和說明書中提到，臺南高商自成立以來報考人數逐漸減

¹²⁵ 〈第五十六回帝國議會貴族院豫算委員第六分科會（鐵道省、朝鮮總督府、臺灣總督府、關東廳、樺太廳、南洋廳）議事速記錄第四號〉、〈同第六號〉，收於貴族院編，《帝國議會貴族院委員會速記錄·昭和篇 8：第 56 回議會》（東京：東京大学出版會，1990），頁 143-172、215-222。

¹²⁶ 〈石黑局長上京〉，《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3 月 11 日，第 2 版；〈文教局長上京用務〉，《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3 月 12 日，夕刊第 1 版；〈臺南高工開設準備 石黑局長上京奔走中〉，《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3 月 23 日，夕刊第 1 版。石黑文教局長利用返國機會，開始物色日後擔任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校長之籌備委員長人選，並預定仿效當年臺北帝大先例，於 1931 年開校前派遣教授出國研修。

¹²⁷ 《臺灣總督府府報》，1929 年 3 月 24 日，頁 75-76；〈臺南高商廢止之官制公布〉，《臺灣時報》1929 年 4 月號，頁 13。

少，入學者年年未達定額，而臺北高商方面，畢業生就業情形亦不盡理想，有鑑於此，認為臺灣存在二所高商並非適當；加上現今臺灣尚無工業方面之專門學校，為順應產業政策以完備教育設施，故擬將臺南高商廢校並併入臺北高商，從而在財政上擲節經費，得以較充裕之財源移撥資助新設立的高工。¹²⁸

公文書雖明示政策理由，但從表五可知，臺南高商入學狀況並非如此乏善可陳，南北兩校相較，臺南高商報考人數鮮少是事實，或許與不在內地招考有關，¹²⁹然而錄取人數幾乎足額，是否為湊齊定額人數以致造成素質低落，則未可知。實際上，總督府的主要用意乃在藉此整頓高商教育體制，挽救其虛有其表且「招牌搖搖欲墜」的教育危機，¹³⁰這才是當局考量的重點。至於經費調配部分，若再試從表四觀之，臺南高商年占約全臺 1 至 2% 之教育經費轉用為設立高工，應是少有所助益，尤其 1929 年至 1931 年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籌備期間，除臺北帝大一向資源偏多外，可發現多數學校（含其他）也受到些許的擠壓。當然，臺北高商增加的部分，必須考慮到臺南高商併入之緣故，但隨後 1930 年 3 月臺南分教場結束，臺北高商的分配比率和經費也隨之降減。

表五 臺北高商、臺南高商歷屆招生統計表（1926-1928）

年度	人數 族群	臺北高商		臺南高商		合計		備註 招生名額
		報考	錄取	報考	錄取	報考	錄取	
1926	臺灣人	18	4	48	35	66	39	臺北高商 80 臺南高商 70
	日本人	417	72	100	35	517	107	
	小計	435	76	148	70	583	146	
1927	臺灣人	26	3	25	15	51	18	臺北高商 80 臺南高商 70
	日本人	502	69	87	52	589	121	
	小計	528	72	112	67	640	139	
1928	臺灣人	24	3	31	11	55	14	臺北高商 72 臺南高商 71
	日本人	412	69	133	60	545	129	
	小計	436	72	164	71	600	143	

資料來源：根據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編，《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第 25-27，核算編製而成。

¹²⁸ 〈台湾總督府諸學校官制中ヲ改正ス〉，《公文類聚》第 53 編・昭和 4 年・第 10 卷・官職門 7・官制 7（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A01200592000・類 01673100）。

¹²⁹ 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の台湾》（東京：岩波書店，1988），頁 159。

¹³⁰ 〈廢校やむを得ず 某消息通の談〉，《臺灣日日新報》，1928 年 12 月 14 日，第 2 版。

六、結論

經由以上探討得知，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的設立涉及廣泛而複雜的歷史層面。就時代背景而言，伴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景氣隆替興衰之衝擊，日本帝國對臺經營策略面臨改弦更張的新局面，在南進擴張之因勢利導下，農業本位的臺灣逐漸向工業化轉型發展，而順應殖民地定位轉換以及產業結構之變遷，提供工業建設所需人力資源的實業教育改革，遂成為繼二次臺灣教育令頒訂與修正後，殖民當局需正視且待解決的重要課題。

臺灣教育令於新舊交替之後，總督府在專門教育領域進行整編統合，而培養高階工業技術人員的高等工業學校設置議題，也在此時逐漸受到關注。1922年新臺灣教育令公布實施之際，當局為因應民間請願運動，高工設置案作為商專廢校替代方案選項之一，而被官方提出，其主要人物內務局長末松偕一郎站在建立完整的專門學校體制觀點，描繪設立高工之未來理想願景，但後來因總督更迭與財政等因素而未見實現。至伊澤多喜男總督時代，當局再度承受民間運動壓力，同時體認專校南北地域均衡與財政經費考量，乃採取捨高工立高商方式，在內地中央政府妥協下，作為權宜之計的臺南高商於 1926 年成立。

嗣後，1927 年上山滿之進總督為貫徹其文化經濟並行並進的治臺理念，召開總督府評議會全面檢討臺灣實業教育，而高工設置論也在此時重新浮出檯面，且和海外發展論述相互結合，其主張充分反映出以松岡富雄為首的在臺日人階層，對臺灣實業教育要求改革的民間呼籲。設立高工之意見，隨後由繼任的川村竹治總督於 1928 年付諸具體政策推動，惟基於財政理由，遂以廢舊立新之調整方式，將體質脆弱之臺南高商予以裁撤，並以此作為交換條件，擇定高工設校於臺南。

高工設置議論的起伏或決定專校存廢之政策走向，不可忽略地，教育經費實為背後最大的主因，尤其為鋪陳高等學校、帝國大學之升學路徑，1920 年代總督府的教育政策重心與經費投資集中於發展高等普通教育系統。因此，無論是替代商專廢校之高工案、或捨高工立高商，乃至於廢高商立高工等政策，專門學校體制的調整明顯受到財政資源分配之影響。

另外，從殖民教育體制觀之，作為發展工業預備計畫之高等工業學校的創設，不僅擴充實業專門學校領域、提升工業教育層級，並得以自立生產方式培育高階工業技術人才而不再仰賴內地；同時，亦可擴大且暢通升學機會管道，以期達到截留臺人赴海外留學、續留在臺日人永住活動的效果，進而培植殖民地與南進策略所需之學術資源和經營人才，無庸諱言，確實符合時代社會需求以及殖民統治者之期待。正如日本內地對臺灣教育制度的看法與立場，新設專門學校之目的與教育對象乃是為在臺日人，而非收容內地過剩學生。

總之，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的設立，關係遠溯自新臺灣教育令施行以降，近 10 年間專門教育制度在臺南地區錯綜複雜的歷史糾葛。商專、高商、高工相繼興廢之歷程，一方面顯示受制於日本國內政黨內閣輪替的連動影響，臺灣總督更迭頻繁導致教育政策方針缺乏連貫性；另一方面也反映總督府當局在考量財政經費因素、南北地域平衡原則，以及專門教育學制改革等問題上，周旋於內地中央政府和複雜的民眾運動者之間，不斷適應時勢推移而修正調整並重構完備的專門學校教育體制。

本文探究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的成立經緯，除理解日治時期實業專門教育政策制度之歷史演變外，並將考察視角擴及兼顧帝國日本場域中與臺灣的互動關係、殖民當局自身考量之內在諸多條件因素，以及地方階層民情動向等脈絡，則更能洞悉學校創設的具體全貌。至於設校構想付諸政策施行後，於 1929 年 4 月進入籌備階段之實際推動情形，以及正式建校成立後整體校務如何運作發展等問題，將作為日後研究課題另文討論。

引用書目

- 東京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蔵，《公文類聚》，編號：A01200619500・類 01735100、A01200550600・類 01567100、A01200592000・類 01673100。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蔵，〈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 3451，文號 31。
- 《臺南新報》，1922-1926 年。
- 《臺灣日日新報》，1912-1930 年。
- 《臺灣民報》，1926-1929 年。
- 《臺灣時報》，1913-1931 年。
- 《臺灣總督府府報》，1926-1929 年。
- 《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手稿本）。
- 〈ザ・選挙〉，下載日期：2010 年 3 月 20 日，網址：http://www.senkyo.janjan.jp/election/1930/99/008436/00008436_23251.html。
- 川村竹治
1930 《臺灣の一年》。東京：時事研究會。
- 上山君記念事業會（編）
1941 《上山滿之進》，上卷：傳記、詩文。東京：成武堂。
- 中村孝志
1988 〈台湾と「南支・南洋」〉，收於氏編，《日本の南方関与と台湾》，頁 1-31。奈良：天理教道友社。
- 王 榮
2002 〈日本統治時代の台南高等工業学校に関する一考察〉，《現代台湾研究》23: 57-71。
- 王耀德
2009 〈日治時期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之入學問題與族群關係〉，《臺灣史研究》16(2): 23-62。
- 古澤勝之
1934 〈祝辭〉，收於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校友會編，《龍舌蘭：開校祝賀式記念號》，頁 15。臺南：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校友會學藝部。
- 田中一二
1928 《臺灣の新人舊人》。臺北：臺灣通信社。
- 矢内原忠雄
1988 《帝國主義下の台湾》。東京：岩波書店。
- 伊形徳一
1979 《碌々四十年》。東京：東宣出版。
- 伊澤多喜男傳記編纂委員會（編纂）
1951 《伊澤多喜男》。東京：羽田書店。

伊沢多喜男文書研究会(編)

2000 《伊沢多喜男関係文書》。東京：芙蓉書房。

吉田寅太郎(吉田靜堂)

1933 《續財界人の横顔》。臺北：經濟春秋社。

吉野秀公

1927 《臺灣教育史》。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吳文星

1993 〈日據時期臺灣的高等教育〉，《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25: 143-157。

吳文星等(主編)

2001 《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吳昌才

1927 〈評議會に關する感想の一片〉，《臺灣時報》1927年11月號，頁11。

吳密察

1991 《臺灣近代史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

李崇禮

1927 〈督府評議會に對する感想〉，《臺灣時報》1927年11月號，頁12。

汪知亭

1978 《臺灣教育史料新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里見文義

1991 〈凡愚のたわごと〉，收於台南高等工業學校同窓會，《鳳木會會報特別号：六十周年記念》，頁116-122。橫濱：開校60周年記念事業企画委員會。

周明德

1990 〈臺灣第一座高爾夫球場七十年回顧：臺灣高爾夫俱樂部簡史〉，《臺北文獻》直字93: 101-123。

宗代策

1939 《小林躋造傳》。東京：帝國軍事教育會。

岡本真希子

2008 《殖民地官僚の政治史：朝鮮・台湾總督府と帝国日本》。東京：三元社。

林孟欣

2002 〈日治時期的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收於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編，《成功的道路：第一屆成功大學校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29-244。臺南：國立成功大學。

林鐘雄

1998 《臺灣經濟經驗一百年》。臺北：自刊本。

松岡富雄

1913 〈南洋視察談：比島の經濟的價值〉，《臺灣時報》1913年11月號，頁43-47。

1913 〈南洋視察談(承前)：比島の經濟的價值〉，《臺灣時報》1913年12月號，頁42-47。

波形昭一

2000 〈殖民地台湾の官僚人事と經濟官僚〉，收於波形昭一、堀越芳昭編著，《近代日本の經濟官僚》，頁303-336。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

涂照彥

1991 《日本帝國主義下の台灣》。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後藤乾一

1995 《近代日本と東南アジア：南進の「衝擊」と「遺産」》。東京：岩波書店。

若槻道隆

1931 〈臺南高等工業學校の開校に當りて〉，《臺灣時報》1931年6月號，頁1-6。

徐聖凱

2009 〈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海南製粉株式會社

1927 《第拾五回營業報告書：昭和元年下半年》。基隆：自刊本。

1927 〈株主名簿（昭和元年12月31日現在）〉。基隆：自刊本。

秦郁彥（編）

2001 《日本官僚制綜合事典 1868-2000》。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編）

2002 《成功的道路：第一屆成功大學校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立成功大學。

張宗漢

1980 《光復前臺灣之工業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瑜

2007 〈台北帝國大學設立構想に関する研究〉，《教育実践学論集》8: 113-124。

陳俐甫

1991 〈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沿革（1919-1947）〉，《臺北文獻》直字95: 81-97。

陳順清

2007 〈1927-1956之臺灣工業教育：以臺南工業專門學校與臺灣省立工學院為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衆議院（編）

1990 《帝國議會衆議院委員會議錄・昭和篇9：第56回議會》。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貴族院（編）

1990 《帝國議會貴族院委員會速紀錄・昭和篇8：第56回議會》。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楊玉姿、張守真

2008 《高雄港開發史》。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

溝口敏行、梅村又次（編）

1988 《旧日本植民地經濟統計》。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

鈴木辰三

1930 《臺灣文官武官民間職員錄》。臺北：臺灣文官武官民間職員錄發行所。

臺灣教育會（編）

1939 《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臺灣教育會。

臺灣新民報社（編）

1937 《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學務課(編)

1921-1926 《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第18-23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學務課。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編)

1927-1933 《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第24-30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編)

1943 《臺灣農業年報：昭和十七年版》。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商業學校(編)

1930 《臺北高等商業學校一覽：昭和五年度》。臺北：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商業學校。

鄭麗玲

2002 〈帝國大學在殖民地的建立與發展：以臺北帝國大學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2008 〈日治時期臺灣人的工業教育(1912-1925)：以臺灣總督府工業講習所為例〉，《臺灣風物》58(2)：95-134。

2009 〈近代化、平等化與差別化之間：臺北工業學校學生之就學與就業〉，《臺灣史研究》16(4)：81-114。

鄧相揚

2008 《臺灣的心臟》。南投：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橋本白水

1924 《評論臺灣之官民》。臺北：南國出版協會。

1928 《臺灣の事業界と人物》。臺北：南國出版協會。

1930 《臺灣統治と其功勞者》。臺北：南國出版協會。

謝濟全

2009 《山子頂上的草根小紳士：日治時期嘉義農林學校之發展》。臺北：稻鄉出版社。

鍾淑敏

2004 〈臺灣總督府的「南支南洋」政策：以事業補助為中心〉，《臺大歷史學報》34：149-194。

藤井康子

2005 〈1920年代台湾における台南高等商業学校設立運動〉，《日本の教育史学》48：61-71。

鷺巢敦哉

1938 《臺灣警察四十年史話》。臺北：自刊本。

Founding of Tainan Technical College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Era

Yao-te Wang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background and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on the founding of Tainan Technical College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By analyzing the changes in the specialized education system,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stablishment theory of technical college and the factors of influencing policy decisions to shed light on the founding history of specialized vocational schools in the colonial education system. This analysis revealed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stablishment of technical college and the gradual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 from an agricultural society to an industrial nation after World War I. In addition, technical colleges were founded in response to the growing need of human resources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ollowing the proclamation of two times of Education Acts and their amendments,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 Office conducted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advocated to combine the establishment of technical college with the overseas development.

Nevertheless, there was a controversy against the policy-making; in particular, the founding of Tainan Technical College to replace the Tainan Commercial College. Such policy had significantly impacted the intricat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specialized education system in Tainan for a decade. On the one hand, the high turnover of the Governor-General of Taiwan due to partisan politics in Japan led to inconsistency of the colonial education policy. On the other hand, the subtle interactions were taken place between the Japanes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demonstrators of popular movement in Taiwan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fiscal budget, the balanc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specialized education reforms introduced by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To modify and adjust the infrastructure of the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e fields of medicine, agriculture & forestry, business, and engineering made the specialized education system be gradually established and adapt to the trend of the times change.

Keywords: Japanese Colonial Era, Specialized Vocational College, Establishment Theory of Technical College, Tainan Technical College, Tainan Commercial College

